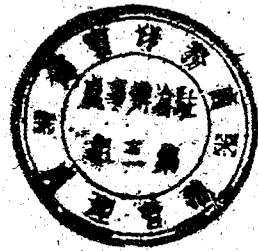


王德亮編著

曾國藩之民族思想

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MG
K827=52
37

王德亮編著

曾國藩之民族思想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

3 2167 8677 6

目錄

自序

一 組織湘軍志在保衛鄉里維持名教.....一

二 湘軍崛起為滿漢勢力消長之關鍵.....一五

三 培植湘軍使重心轉移避免清廷之嫉視.....一八

四 湘軍演變為北洋軍蔭湘軍未竟之志.....三一

五 辛亥武昌起義北洋軍與革命軍合力推翻滿清.....三四

六 撤退之湘軍大部加入哥老會從事革命運動.....四八

七 重刻船山遺書欲廣佈民族思想於社會.....五二

八 外交政策注重自立自強以樹威信.....五六

九 積極提倡洋務以圖裨禦更大之外侮.....六〇

十 結論.....七三

附陶希聖先生覆著者原函.....七九

跋.....八〇

自序

愚賦性樸拙，寄籍江淮，早罹艱屯，旋讀旋報。弱冠以還，絞課而外，兼嗜雜籍，恣意瀏覽。薰研乙部，則章太炎先生之感召，致力報學，迺因于右任先生之啓示，歲月空徂，卒鮮一精，言之殊增慚慚。迨先後濫學中央掃蕩報，時閱十載，爲編撰職務牽制，更乏餘力從事學問。雖抱敬以治事，恕以待人，勤以補拙，儉以養廉之志，而亦感躬行之未逮，居常引以爲憾！

二十九年春，由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歸來，重沐總裁薰陶，凜然有動於中，愈感有淬礪必要，爰有「燈餘」之刊行，以誌過去鴻泥，爲個人生活劃一時代。旋擬對現在抗戰之精神總動員方面，有所靖獻，因於公餘覓隙，從事「中華民族禦侮自衛文獻」之編纂，以期讀者咸發興起，同仇敵愾，加強戰鬪意志，與政府國策相配合，早日逐敵於國門之外，闕兩載而竣。將從事於「中華民族光榮史」之增訂，便一般青年，獲窺先民之豐功偉績，而增強其愛國思想。

忽感於世人對曾國藩之道德文章功業，雖深致景仰，然仍多以其平洪楊一事而少之，謂爲効忠異族，扶滿抑漢，昧於民族大義，甚至詆之爲漢奸者。惡！是何言！是何言！是何言！是殆循名忘實，得貌遺神，不深嘗曾氏所處之環境也！用是不揣禿昧，徵諸文獻，考其原委，網羅衆說，加以抉擇。擬對其組織湘軍動機，由於保衛鄉里，維持名教（以今語釋之，則爲維持民族固有文化），重刻船山遺書，欲廣佈民族思想於社會，加以闡揚，而未敢定也。既而觸類引伸，下筆不能自休，變成數萬言。揆諸本證而協，論之旁證而通，雖別開生面，輿論論抵牾，然學貴創筵，不尙雷同；又嘗徵詢當世賢達意見，僉蒙嘉許。因此勇氣倍增，不敢深闕固執；意發潛德幽光，使曾氏之苦心孤詣，大白於天下，不致再蒙不潔之名耳！今茲距其逝世，蓋七十有一年，而遺書孤行海內，朝野稱頌勿衰，謂非行能卓絕，詎能如是哉！愚於曾氏，雖服膺有年，深憾未獲親炙，而又鑿鑿

荒谷，參考書籍，不易搜羅，宮牒美富，曷敢妄云窺見。僅物述其凡，聊誌「仰之彌高」之意云爾。世之景行
湘鄉者，或亦有取於斯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古吳王德亮識於陪都龍門浩塗山北麓蓮花山敬恕寄廬。

曾國藩之民族思想

一 組織湘軍志在保衛鄉里維持名教

清咸豐初年，太平軍席捲東南各省，分途北上，響應者蜂起，社會騷擾，均被破壞，海內騷然。時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突經變亂，人心惶惶，謠言四起，雖未見太平軍之地，亦相率挈家驚走，莫知所措。綠營將士，既窳敗難用，各省辦團練者，尤鮮成效。曾國藩以侍郎子母憂在籍，遇鄉里人則教之以保守之方，鎮靜之道。迨太平軍攻湖南省城既解圍，巡撫張亮基留江忠源之楚勇二千人駐長沙防守，札委湘鄉諸生羅澤南、王鑫等招募湘勇千人以往。國藩奉命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，當即草疏懇請在家守制，並具呈請巡撫張亮基代表，繕就未發，適巡撫專弁以函致國藩，告武漢失守，人心惶恐，懇即一出。庶吉士郭嵩燾亦至其家，力勸出保桑梓，其弟國荃又贊成之，乃燬前疏，於咸豐二年十二月，出治鄉兵於長沙。兵非素習，手無斧柯，又乏度支轉運之供，羽檄調度之權，其困難殆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嗣以團練保衛鄉里，不能越境剿敵，始疏請募爲官勇，仿前明戚繼光成法，束伍練技，編爲湘勇，以備不時之需，令羅澤南、王鑫、塔齊布、鄒壽璋、周鳳山、諸政躬及其弟國荃分將之。翌年七月，移駐衡州，創建水師，以成名標、諸殿元、楊岳斌、彭玉麟、鄒漢章、龍獻琛、褚汝航、夏燮、胡嘉垣、胡作霖等分統之，此爲湘軍組織伊始之情形也。試觀曾氏致歐陽牧雲一函，即可知其所以不顧一切，出而任事，乃由於湖北失守，長沙驚慌，不得不起而保護桑梓，抑亦義不容辭也。茲錄其原函如次：

「牧雲仁兄大人足下，前借寫就，正擬專人送至省城，請張撫台代爲發摺。十五夜，接張撫台來信二件，知武昌失守，不勝駭歎，郭雲仙亦於十五夜來我家，勸我到省，幫辦團練等事。弟以湖北失守，關係甚



大，又恐長沙人心惶懼，理宜出而保護桑梓，即於十七日由家起行，二十一日抵省。先以稽查城內土匪奸細爲要務，其次則勤於操練。……」

又觀其致九弟沅甫書云：

「劫數之大，良可歎悼！然使堯舜周公孔生今之世，亦不能謂此賊不應痛剿。」

太平軍由桂北上途中，嘗頒布三道檄文：一曰奉天誅妖檄文，二曰諭救世人檄文，均爲倡行耶教，勸人崇拜上帝者。三曰奉天討胡檄文，則爲痛述滿人壓迫漢族，閭閻民族親念。論者僉謂奉天討胡檄，詞意冠冕堂皇，簡易引起漢族同情，其餘二檄，則違反中國國情，爲洪楊失敗之重大原因。茲將其奉天誅妖檄原文，摘誌如下：

「據舊詔靈書天文皇上帝，嘗初六日造成天地，出口人物，皇上帝是神爺，是魂爺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無所不在，天下萬國，俱有記及皇上帝之權能。溯自皇上帝造有天地以來，皇上帝大發威怒屢矣，爾世人還未知乎？皇上帝第一次大怒，連降降一自四十夜大雨，洪水橫流矣。第二次大怒，皇上帝降凡救以色列出麥西圖矣。第三次大怒，皇上帝遣救世主耶穌降生猶太國，替世人贖罪受苦矣。今次又大怒，丁酉歲，皇上帝遣天使接天王昇天，命誅妖，復差天王作主救人。戊申歲，皇上帝恩憐世人之陷溺，發妖魔之迷纏，三個月，上主皇上帝降凡，九月，救世主耶穌降凡，顯出無窮權能，誅盡幾多魔鬼，揚場大戰，妖魔何能關得天過。且問皇上帝何怒，乃怒世人拜邪神，行邪事，大犯天條者也。爾世人還未醒乎？生逢其日，得見皇上帝榮光，爾世人何其大幸！生遇其時，得見太平天日，爾世人何其大幸！好醒矣！好醒矣！願天者存矣，逆天者亡矣。……爾等是上帝子女，爾等知否？本師曾言爾等，爾等肉身，是爾凡肉父母所生，爾等靈魂，是上帝所生，上帝是本軍師親爺，亦是爾等親爺，又亦是天下萬國人民親爺。此所以古語云：「天下一家，四海皆兄弟也。」今爾等丟親爺，拜魔鬼，魔鬼是上帝親爺親敵，亦是本軍師親敵，又亦是爾等及天下萬國人民親敵。魔鬼者何？就是爾等所拜祭各菩薩偶像也。各菩薩偶像者何？就是此魔紅眼睛「閻羅妖」之

妖徒鬼卒也。蛇虺紅眼睛「闖羅妖」者何？就是上帝當初這天造地之時，所造出之毒蛇。今既變為妖怪，能變得十七八變，東海龍妖亦是他，正是妖頭鬼頭，專迷惑纏捉凡人靈魂，落十八重地獄，做他妖徒鬼卒，聽他受用淫污者也。

爾等靜想，魔鬼既是專迷惑纏捉上帝子女，就是專迷惑纏捉本軍師弟妹，非是本軍師讎敵，亦是爾等及天下萬國人民讎敵而何？夫魔鬼既是讎敵，焚擊之不暇，反伸首就他，任其纏捉，俗語云：「豆腐是水，閻羅是鬼。」又俗語云：「走鬼走入廟」，爾等聽過否？爾等果有靈心未死，將此等俗語靜想，亦可以豁然醒悟追悔，丟子親爺莫大之罪，且中了讎詭計，後來墜入地獄沉淪，聽魔鬼淫污，狗咬賤，賤過狗矣。」又其諭救世人傲文云：

「今天父上主皇上帝，恩憐凡人，中魔鬼毒計。丁酉歲，差天使接天王昇天，上帝親命天任誅妖，復差天王降凡，作主救人。戊申歲，三月，上帝降凡主張，九月，天兄耶穌降凡拯救，今既五年矣，本軍師不實情諷明爾等，爾等無知，反天逆天，致陷地獄，受千年萬萬載永苦，本軍師問心何忍，故今特剖明爾等，速即丟魔鬼，歸親爺，方可受天百祿也。……且爾等本身，既認識上帝親爺，脫鬼成人，在世榮耀無比，在天享福無疆，永遠威風，永遠尊貴，豈不勝過羗妖變鬼，生則受鬼迷纏，死則作鬼奴卒，受其淫污惡毒，變成大腫麻瘋，變成難看惡鬼，永遠在十八重地獄，受無窮無盡苦楚也。孰得執失？何去何從？必有能辨之者。如有能辨之人，速即反戈替天誅妖，以獎上帝主意，上帝幸甚。……」

統觀傲文大意，視上帝為神爺，稱耶穌為天兄，目菩薩為魔鬼，充滿怪誕色采，其不合中國國情，昭然若揭，誠所謂「名教之奇變」，「鬼神所共憤怒」者也。試將曾氏之「討粵匪檄」文比照讀之，即可知其組織湘軍之動機，完全由於保衛鄉里，維持名教，針對洪楊之倡行耶教，到處毀壞廟宇，擾亂地方而發也。曾氏所頒布之檄，原文節錄如次：

「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，於今五年矣！荼毒生靈數百餘萬，蹂躪州縣五千餘里，所過之境，船隻

無論大小，人民無論貧富，一概搶掠罄盡，寸草不留。其虜入賊中者，剝取衣服，搜括銀錢，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，卽行斬首。男子日給米一合，驅之臨陣向前，驅之築城濬濠；婦女不肯解脚者，則立斬其足，以示衆婦；船戶而陰謀逃歸者，則倒擡其屍，以示衆船。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，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，曾犬豕牛馬之不若。此其殘忍慘酷，凡有血氣者，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！

自唐虞三代以來，歷世聖人，扶持名教，敦敍人倫，君臣父子，上下尊卑，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。粵匪竊外夷之緒，崇天主之教，自其僞相，下逮兵卒賤役，皆以兄弟稱之，謂惟天可稱父，此外凡民之父，皆兄弟也；凡民之母，皆姊妹也。農不能自耕以納賦，而謂田皆天王之田，商不能自賈以取息，而謂貨皆天王之貨，士不能誦孔子之經，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，漸約之書。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，詩書典則，一旦掃地蕩盡。此豈獨我大清之變，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，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！凡讀書識字者，又烏可袖手安坐，不思一爲之所也？自古生有功德，沒則爲神，王道治明，神道治幽，雖亂臣賊子，窮凶極醜，亦往往敬畏神祇。李自成至曲阜，不犯聖廟；張獻忠至梓潼，亦祭文昌；粵匪焚柳州之學宮，燬宣聖之木主，十哲兩廡，狼藉滿地。嗣是所過郡縣，先燬廟宇，卽忠臣義士，如關帝岳王之凍凍，亦皆汚其宮室，殘其身首，以至佛寺道院，城隍社壇，無廟不焚，無像不滅，斯又鬼神所共憤怒，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！

本部堂奉天子命，統師二萬，水陸並進，誓將臥薪嘗膽，殄此凶逆，救我被擄之船隻，拔出被脅之民人，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，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，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！是用傳檄遠近，咸使聞知。倘有血性男子，號召義旅，助我征剿者，本部堂引爲心腹，酌給口糧，倘有抱道君子，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，赫然奮怒，以衛吾道者，本部堂禮之幕府，待以賓師；倘有仗義仁人，捐銀助餉者，千金以內，給予實收部照，千金以上，專摺奏請優敘；倘有久陷城中，自拔來歸，殺其頭目以

城來降者，本部堂收之帳下，奏授官爵；倘有破管經年，髮長數寸，臨陣棄械，徒手歸誠者，一概免死，資遣回籍。……」

其欲捍衛地方，維持名教之苦心，充滿行間，不難窺見其旨趣所在，而絕非志在扶滿矣。又觀咸豐三年十月，清帝所頒上諭，嘗言：

「曾國藩團練鄉勇，甚爲得力，剿平土匪，業經著有成效，著酌帶練勇，馳赴湖北，所需軍餉等項，著略乘章籌撥供支。兩湖唇齒相依，自應不分畛域，一體統籌。」

及咸豐四年四月清帝復頒上諭，又言：

「曾國藩初次接仗，卽有挫失，且戰船被風沈損多隻，何事機不順若是？現在湖北待援孔亟，曾國藩以在籍紳士，若祇專顧湖南，不爲通籌全局之計，平日所以自許者安在？」

曾氏於其復田鏖堂函中，亦嘗言之，如謂：

「弟以菲材，謬膺重寄，其初辦理團練，略招勇丁，以剿土匪；其後四方多故，事會相招，遂有不克中止之勢。……」

則知曾氏之率領湘軍出境，征討太平軍，實非得已，而非其初衷矣。由捍衛鄉里而推及於鄰省，是乃仁愛之心所擴充也。厥後湘軍驅逐太平軍出湖南境，遂克武漢蕪黃，肅清湖北，長驅千里，席捲無前，各路之討洪楊以立功者，咸倚曾氏以爲重，湘勇之旌旗，遂飄揚於各地。以保衛鄉里，維持名教之舉，而終以底定國內，轉移風氣，斯誠近古未嘗有，抑亦出於曾氏意料之外也！試再觀其他諸人對於曾氏組織湘軍之紀載，更可證實吾說之有自矣。如章太炎先生在其所著檢論中，謂：

「湘軍之夷洪氏，名言非正也，洪氏以夏人建建夷，不修德政而暴戮是聞，又擴張耶教以軼干之。曾國藩左宗棠之起也，其始不過保衛鄉邑，非敢贊清也。」

羅爾綱氏於其所著太平天國史綱中，謂：

「湘軍的幹部人物，則爲曾國藩所物色出來的邊帶鄉氣的能幹肯有血性的儒生，湘軍的下級羣衆，則爲土著的農夫，湘軍的訓練，則以儒家的仁字禮字的精神去教訓。……所以初期的湘軍，實可說是含有儒教色彩的軍隊。至於湘軍的精神與信條，我們從曾國藩的討粵匪檄中，更分明的看得出來。……此檄一方面，嚴數太平軍擾亂社會的安甯，破壞中國固有的人倫與社會的制度，強迫人民信仰上帝教與焚燒神靈及寺廟，另一方面，以地方性刺激兩湖三江的人民，以名教奇變，刺激士大夫階級，以神佛刺激下級羣衆。湘軍的幹部人物爲儒生，儒生階級所特以爲護符者爲名教，湘軍的下級羣衆爲農夫，農夫所信仰者爲神佛。故曾氏此檄，能夠同時喚起儒生與農夫的同情，教他們各爲自己的地位或信仰，而向敵人一致的鬪爭。湘軍的精神在此，湘軍的信條也在此，所以湘軍與太平軍這兩個壁壘的鬪爭，一方面我們可以說是宗教的鬪爭，因爲湘軍的信仰，是儒教道教和佛教，而太平軍的信仰，則爲上帝教。」

稻葉君山在其所著清朝全史中謂：

「湘中主將皆係書生，祇知中國固有之學問名教，曾之檄文，實湘軍之精神，彼指摘洪軍焚柳州之學宮，孔子之沐主及十哲之兩廡等，謂孔子孟子當痛哭於九泉，此語最爲緊要，後日洪軍之政策，亦許讀孔孟書，以冀人心之和緩矣。湘軍非勤王主義，亦非雷同性之侵略，意在維持名教，卽恢復異宗教之南京是也。是故湘軍可稱爲一種宗教軍。……湘軍組織之動機，非對於朝廷之義務，……全由自衛之必要而起。……」

又謂：

「彭玉麟爲長江水師之指揮者，三十餘年之久，嘗從軍之初，立二誓約：其一曰不私財，其二曰不受朝廷之官。咸豐十一年授安徽巡撫，彼辭不受；同治三年，克復南京，賞一等輕車都尉世爵，加太子少保銜，續任爲漕運督，朝覲頻至，彼亦不受。嘗上痛切之辭表曰：『臣本寒儒，備書養母，咸豐三年，母物故，曾國藩謬用虛名，強之入營，初次臣見國藩，誓必不受朝廷之官職，國藩見臣語誠實，許之。願十餘年來，任知府，署巡撫，由提督補侍郎，未嘗一日居其任，應領收之俸給及一切銀兩，從未領納絲毫。……』臣既從

軍，志在滅賊；賊既滅而不歸，近於貪位。夫天下之亂，不徒在盜賊之未平，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退無義，中興大業，宜扶樹名教，振起人心，云云。彼擴張長江水師使至一萬餘人，一切兵餉，以鹽稅及長江釐金稅充之，不煩戶部。亂平後，尙餘六十餘萬，報告兩江總督，寄託於鹽道之手，取其利息，加水師公費。彼曰，予以寒士來，願以寒士歸也。觀以上之事實，湘軍組織之動機，非對於朝廷之義務，又不爲賞爵所激勵，全由自衛之必要而起。然則洪軍之平定，樞紐於湘軍，與朝廷無涉，而朝廷之設施，直隔靴搔癢而已。」

柳詒徵氏在其所著中國文化史中，謂：

「世謂湘軍之精神，在維持名教，觀彭玉麟之宗旨，固可以見湘軍之動機，然亦足徵吾國人之能力，雖以滿清之壓制，亦能崛起而大有爲。」

陳恭祿氏在其所著中國近代史中，謂：

「曾國藩……其兵來自湖南，其地風氣強悍，人民易成精兵，其應募者，原爲保衛家鄉之農民，將校多爲研究理學之學者，其人對於洪秀全之摧殘儒教，莫不痛心疾首而欲滅之，均能驅勉從事，訓練士卒……曾國藩雖非將才，然能謀而後戰，審察利害，不求一時之功，而有深見之方略，太平軍遂遇勁敵。」

陳翔林氏於其所著胡曾左平亂要旨一書中，謂：

「開嘗取胡曾左之事功，與太平天國較論之，胡曾左等有適乎當時國情之中心思想，以資號召；而太平天國所謂天父天兄天弟之說，實不足以敵之。胡曾左等，有互相維繫之中心勢力，以利驅策，而太平天國則自楊韋亂後，互相猜疑，勢力分散，幾不可支矣。胡曾左等自爲克己進賢之中心人物，以樹之模楷，而太平天國之人物，雖如石達開李秀成輩，亦有所不逮焉。」

李肖聃氏嘗於致河貽焜書中，對曾氏有所評論云：

「曾氏自湘起兵，艱難百戰，塔羅激揚忠義，江李盡爲鬼雄，曾公復能本其所學，轉移習尚，剴苦自

勵，屈志求賢，此其所以成功也。討洪檄文中明志義，史家以太平之戰役，比於宗教之戰爭，故其軍爲衛道之師，其人爲命世之傑。在曾公當日，惟知海寇以救民生，平亂以全中國，使吾民不迷於天主之教，新約之書，以弭開闢以來未有之奇變。而論者乃或惜其不爲漢族建蓋世之殊勳，徒爲異族盡款款之愚忠，而足下或未深察，亦偶同於世人之說，是猶論史者曾不考其時代，徒苛論乎古人，吾人不任咎也。」

何貽焜氏於其所著之曾國藩評傳中，亦謂：

「曾氏之生平，最爲時人所詬病者，莫若民族思想之缺乏。考其所以，蓋由於時代背景與家庭環境，有以致之，觀其所作檄文，兢兢以扶持名教是尚，更足見効忠異族，絕非曾公之本意。史家謂「湘軍非勤王之師」，「湘軍如宗教軍」，誠爲篤論。曾公之事業，常爲後人所譏稱者，厥爲太平天國之克服，溯其淵源，固由於曾公有定見、有毅力，能以克己爲體，進賢爲用。惟清室之信任，洪楊之內鬪，似亦予曾公以良好之機會。至洪楊信奉耶教，不合國情，曾公崇尚儒教，深得民心，於軍事之利鈍，更有重大之關係，自極顯然。……」

又謂：

「曾公原喜讀禮，當彼居京時，即曾以議大禮疏，名震一時，其所以特加重禮，蓋以禮爲經世之具，公於王船山遺書序中，嘗謂：「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，而息天下之爭，內之莫大於仁，外之莫急於禮。」於孫芝房侍講獨議序，亦云，「古之學者，無所謂經世之術也，學禮焉而已。周禮一經，自體國經野，以至酒漿廛市，巫卜繕槩，天鳥蟲魚，各有專官，察及纖悉，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，歎邱明之發凡，仲尼之權衡萬變，大率秉周之舊典，故曰周禮盡在魯矣。……」其兢兢於禮，已可概見。……崇尚禮治之目的，在維持社會之秩序，保障人民之安甯，惟其崇尚禮治，故扶持名教，不遺餘力。公於討粵匪檄中，……對太平軍崇奉耶教，破壞中國固有之人倫道德，社會秩序，加以猛烈之攻擊，其意固在維持名教也。稻葉君山於清朝全史中，謂「湘軍非勤王主義，亦非雷同之侵略，意在維持名教，洵有所見。」

薄廷黻氏在其所著中國近代史大綱中，謂：

「太平軍到處破壞寺廟，毀滅偶像，迷信的老百姓看不慣，心中不以為然。各地的土匪，都趁火打劫，太平軍所經過的地方，就是他們容易活動的地方。他們幹他們的事，對於官軍及太平軍，無所偏依，有組織的祕密會社，則附和太平軍，如湖南的哥老會，及上海的小刀會。大多數的士大夫階級，積極反對洪秀全的宗教革命。至於排滿一層，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漢人的恥辱，但是他們一則因為洪秀全雖為漢人，雖提倡種族革命，然竭力破壞幾千年來的漢族文化，滿人雖是外族，然自始即擁護漢族文化；二則因為他們覺得君臣之分既定，不好隨便作亂，亂是容易的，撥亂反正則是極難的，所以士大夫階級，這時對於種族革命，並不熱心。……曾國藩是我國舊文化的代表人物，甚至於理想人物，……家世業農，……是個實踐主義的理學家，無論我們是看他的字，讀他的文章，或研究他的為人辦事，我們自然的想起我們鄉下那個務正業的小農民，他和小農民一樣，一生一世，不作苟且的事情。……他對洪秀全的態度，就是當時一般士大夫的態度，不過比別人更加積極而已。」

那時的兵，不但不能打仗，連鄉下的土匪，都不能對付，所以人民為自衛計，都辦團練，這種團練，就是民間的武力，是務正業的農民，藉以抵抗不務正業的游民土匪。……曾國藩的事業，就是利用這種鄉勇，而加以組織訓練，使它成爲一個軍隊，這就是以後著名的湘軍。團練是當時全國皆有的，並不是曾國藩獨創的，但是爲什麼惟獨湘軍能成大事，原故就在於曾國藩所加的那點組織和訓練。

曾國藩治兵的第一個特別，是精神教育的注重，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遺教，是我民族的至寶。洪秀全既然要廢孔教，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敵人，也就是全民族的敵人。……

他是孔孟的實信徒，他所選的官佐，都是他的忠實同志，他是軍隊的主帥，同時也是士兵的導師，所以湘軍是個有主義的軍隊。……

曾國藩不但利用中國的舊禮教，作軍隊的精神基礎，而且利用宗族觀念和鄉土觀念，來加強軍隊的團結

方。……這樣，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別濃厚，這是湘軍的第二特點。」

張爾生氏於其所著之中國之民族思想與民族氣節中，謂：

「洪楊之興，藉上帝教以惑衆，猶仍會黨之故智。且其悍將羅大綱等，原爲三合會頭目，相結以排滿，殆爲必然之趨勢。……然其迷信神權，帝制自恣，卒未脫草莽英雄之窠臼。至於變易禮教，屠戮極慘，更爲致敗之由。要其從事種族革命，不可沒也。……

設但揭討滿之旗，而不假天主教以亂視聽，不肆行誅戮以激民憤，則湘軍未必能起，即起亦未必能得志。乃計不出此，迷信異教，任用親屬，致石達開李秀成諸將，均不克展其懷抱，錢江黃畹之謀，均不能用，外失奧援，內乏輯睦，幾何不困憊以死也。」

胡哲敏氏在其所編之會國藩一審中，謂：

「會國藩起初本是以鄉人資格，站在保衛鄉土的立場上，爲家鄉努力。清廷見太平軍所過之地，莫不風捲殘雲，而長沙一處，獨安然無恙，始命會國藩以在籍侍郎資格，募爲官勇，出境剿敵。國藩乃擴充鄉勇而爲湘軍，令羅澤南、王鑫、塔齊布、及其弟國葆等分統之。翌年（咸豐三年）又用江忠源、郭嵩瀾等所建水攻之策，購造兵船，編成水師，以楊岳斌、彭玉麟等分統之，自是湘軍水陸師皆完備，遂爲太平軍之勁敵。

雖然：自今日觀之，會國藩以漢人資格，去助清廷爲虐，以殲滅太平軍，似乎太缺乏革命性了。其實會氏與太平軍之不相容，卻另有見地，在他討太平軍檄文中，有一段謂：（檄文已詳前文茲從略）這是會氏與太平軍根本抵觸的所在，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宗教戰爭。所以他始終不懈，爲的就是要維持名教，恐怕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，詩書典則，一旦掃地蕩盡，這是會氏的心跡。是故湘軍初起之時，祇在保衛鄉土，後來便在維持名教。」

魏穆氏在其所著國史大綱中，謂：

「洪楊起事的第一因，在其有一種宗教性之煽惑，而將來所以招惹各方面反對，限制其成功，而逼到失

敗路上去的，便是這一種宗教。

洪楊因地理的關係，開始附會採用西洋的耶教，洪秀全天父天兄的造託，一面攔到廣西深山中愚民的擁戴，一面卻引起傳統的讀書人之反感。……削平洪楊的，並不是滿清政府及其朝臣，而是另外一批讀書人和農民，洪楊的耶教宣傳（並非真耶教），激動了一輩傳統的讀書人之反感。洪楊的騷擾政策，惹起了一輩安居樂業的農民之敵意，會國藩的湘軍即由此而起。……

相傳太平天國團長沙，左宗棠謁見天王，獻攻守建國之策，並勸天王棄天主耶穌，專崇儒教，天王不能用，左遂逃去，為後來削平洪楊之重要人物。如羅澤南彭玉麟等，皆激動於民族文化禮教之保全，以及社會民生秩序之自衛，而奮起殺賊，彼輩不私財，不受朝廷官祿，以書生督領鄉民，自衛地方，而漸次推及於近鄰，乃一躍而為削平洪楊之惟一勢力。湘軍與粵軍（即洪楊）同樣抱有一種民族觀念。粵軍的缺點，在於沒有注意到民族文化傳統勢力之重要，只圖激起革命，甚至對於傳統文化加以過分的蔑棄，一切目之為妖，而別擁偽造的天父天兄，讀聖經，做禮拜，此與滿洲入關雜髮令，一在外面，一入內裏，同樣對於真受民族文化之薰陶，為一種難堪之損傷。……

粵軍的領導人，對於本國文化，既少瞭解，對於外來文化，亦無領略。他們的力量，一時或夠推翻滿清政權，而不能搖撼中國社會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風俗習慣，這是洪楊失敗最主要的原因。（就此點論，洪楊的天父天兄等等愚民政策，與八卦教、天理教等，還是一鼻孔出氣。）而且洪楊最先用以愚民的旗幟，他們並未悟到早已向全民族傳統文化樹敵，而他們軍事上的實際活動，卻又並沒有一個預定的全盤計劃。……湘軍雖係地方團練，而一起即有蕩平天下之整個準備，其用兵次第，亦始終守守一個計劃，按步推進。……清廷雖知會國藩才力可依，然並不會想以削平洪楊事業，全付湘軍之仔肩，忽而令之援浙，忽而令之援閩，忽而令之入川，又忽而令之赴蘇。若使會國藩遊從清廷意旨，必致一事無成，全局失敗而止。惟會之意中，早有一整個討平洪楊之腹本，因此清廷命令，彼必宛轉因應，令其與自己計劃相應而止。其前鋒則由仇

江逐步推進而至安慶，其後部則由湖南逐步推進而至武漢，繼而總打，一面應付洪楊，一面應付清廷，又一面則團結共事之人才。……先後十三年，雖兵事利鈍，瞬息千變，而進退計劃，前後一貫。反觀洪楊，自三王內闕以後，石達開遠行，內部即少可仗之才。李秀成陳玉成僅為戰將，雖東西馳突，不無一逞之威，然中樞不能發縱指示，關外不能利害專斷，狼奔豕突，漫無把握，兩兩相較，成敗自判矣。……

曾國藩雖在軍中，隱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，網羅人才，提倡風氣，注意學術文化，而幕府賓僚之盛，冠絕一時。至於洪楊，自東、北、翼三王內闕以後，天王唯用兄弟戚屬為親信。文治制度方面，在南京十二年，可算絕沒有些微上軌道的建設，亦不能搜羅原來團體以外之人才，卻妄想以天父天兄之欺妄潑山惡民者，欺盡天下，如此何得不敗？」

陳懷氏在其所著中國近百年史中，謂：

「開洪秀全初起兵圍長沙時，有一人布衣單履與秀全論攻守建國之策，多中要害，并勸其棄耶穌，專崇儒教，秀全不能用，其人乘夜逃去。後湘人欲誅此獻策者，人知其姓名，不能得，事遂罷。或曰：此其人，即左宗棠也。」（按此事蕭一山氏於其所著之清代通史中，亦有述及。）

陶希聖氏在其所著中國民族戰史中，亦謂：

「湘淮軍本以保衛家鄉為目的，後來出境作戰，漸由保鄉進而保國。曾國藩以維護禮教號召，轉變人民對洪秀全的同情，成為護教的自衛，保持固有文化，掩蓋了種族仇恨，太平天國便因此失敗了。」

綜觀以上記載：證明湘軍組織之動機，完全由於保衛鄉里，維持名教，而非志在勅忠滿清，固昭昭矣！一時隨曾氏從戎以討洪楊者，大都皆為儒生，讀孔孟書，以抱道自任者，無怪其忠義奮發，必欲平定而後已。使太平軍但揭討滿之旗，不假借天主教以亂視聽，不肆行誅戮以激民憤，則湘軍未必能起，而左宗棠亦必不投入湘營，有可斷言矣！乃石達開之覆曾氏書中，猶有：

「足下（指曾國藩）固嘗讀中國聖賢書者，春秋夷夏之辨，當亦熟聞之矣。自古王猛輔秦，猶未至彰明

寇晉，許衡滅宋，死後猶不欲請謚立碑，蓋內涉神明，不無慚德。」云云。

夫以曾氏之讀聖賢書，其幹部均爲儒生，豈見不及此？豈不知春秋夷夏之辨？遠開殆未深思耳！洪楊發難於金田，以推翻滿清，光復舊物相號召，固爲國人所同情；而倡行異教，務破壞中國一切制度，而又未能得他國完美之法，以爲之導，其不適應中國社會需要，則無可諱言。此其意，柳詒徵氏在其所著中國文化史中已言之。

總理謂：「中國有一個道統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相繼不絕，我的思想基礎，就是這個道統，我的革命，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，來發揚光大。」

總裁謂：「我們要澈底明瞭三民主義，必須尋覓總理的思想出發點。總理的基本思想，淵源於中國正統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。」

惜洪楊不明乎此，乃欲與中國歷史文化漠不相關之邪教，號召國人，以致功敗垂成，不能不爲之惋惜耳！故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編之「中國國民黨黨史概要」中，論太平天國失敗之原因，謂：

太平軍的思想，背反了中國的文化精神，他們所標榜的教旨，和中國文化思想根本衝突，如主張廢除孔教，不拜祖宗等，都是中國人最不能容忍的。所以曾國藩等便特別攻擊這一點，振振有詞，藉以引起社會人士對太平軍的厭惡和反感。」

梁任公先生在其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中，亦謂：

「洪秀全之失敗，原因雖多，最重大的，就是他拿那種「四不像的天主教」做招牌。因爲這是和國民心理最相反的，他們那種殘忍的破壞手段，本已給國民留下莫大惡感，加以宗教招牌，賈怨益甚。中國人對於外來宗教，向來采寬容態度，到同治光緒間，教案層見疊出，雖由許多原因湊成，然而洪秀全的「天父天兄」，當亦爲原因之一。因厭惡西教，而遷怒西學，也是思想界一種厄運了。」

因此之故，曾氏目擊心傷，是以受至友之激勸，毅然而起，領導儒生及農夫，以保衛鄉里，維持名教爲己任，幾無反顧也。世人未加深察，而申申言之，以致曾氏功過不明，是非莫白；且將使數典忘祖，倡導異說，不適

國情者，更恣肆而無所忌憚；此愚所以不能不辭而闢之也！

曾氏對用兵之道，主因時制宜，不尚執一不變，嘗於所著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一文中言之。如謂：

「禮俗政教，邦有常典，前賢猶因時適變，不相沿襲。況乎用兵之道，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，豈有可泥之法，不敵之制？今之水師，蓋因粵賊之勢，立一時之法，幸底於成耳。異日時易勢殊，寇亂或興，若必徃於前事，謂可平粵賊者，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，此非智者所敢任也。惟夫忠臣謀國，百折不回，士勇赴敵，視死如歸，斯則常勝之理，萬古不變耳。其他器械財用，選卒校技，凡可得而變革者，正賴後賢相時制宜，因應有方，彌縫前世之失，俾日新而月盛。又烏取夫顧已守常，姝姝焉自悅其故迹，終古而不化哉！」

厥後湘軍演變爲淮軍，淮軍編制，悉仿湘軍，惟器械稍有更迭，殆亦相時制宜，不泥於成法，以應天下無窮之變者也。

二 湘軍崛起爲滿漢勢力消長之關鍵

湘軍組織之動機，由於保衛鄉里，維持名教，而非扶滿抑漢，愚已於上節略言之。然不僅非扶滿抑漢，而按諸實際，則爲扶漢抑滿，爲滿漢勢力消長之重大關鍵，與世俗之論，完全相反也。柳詒徵氏於其所著之中國文化史中嘗言之，略謂：

「由太平軍之反動，而滿洲之勢力益衰，湘軍崛起，以養生農夫，奮死與洪楊角逐，而後滿洲之兵權幾完全歸於漢人之手。淮軍繼之，參以西法，遂開近數十年軍閥之統系焉。」

「在太平天國興起以前，清廷將相要職，漢人從無居之者，中國的政權，是全提在滿人的手中。到了金田發難，……滿廷無法維持其統治，纔不得不以平亂之責，寄於漢人。同治初元，曾國藩總督兩江，管轄四省，長江三千里，幾無一船不張曾氏旗幟。四省釐金，絡繹輸送，各處兵將一呼百諾，東南財賦之區，盡歸曾氏一人掌握，當日湘軍一系人物，「苟能軍無不將帥者，苟能事無不軒冕者。」繼起的淮軍，其勢力也差相埒。故到太平天國既平，封疆大吏，漢人居其強半，固不待說；卽內而樞府，自沈桂芬入掌軍政，開漢人執政的先例。其後李鴻藻、翁同龢、孫毓汶、徐同儼繼之，政府實權，也歸漢人掌握。於是從前滿人統治的局面，便換了漢人統治的局面。

至於從中央集權，漸轉到地方分權，這一點上，我們也同樣的很明顯地看得出來。本來中央集權的政制，中國自宋明以來，便已經很鞏固了，國家權力都集中於中央政府，內外彼此互相牽制，而天子執長鞭以管畜之，所以雖待中十年，開府千里，而一詔朝下，印綬夕解，束手就吏，無異匹夫。清繼前代中央政府之權力，較宋明爲尤重。……但是到了太平天國既平，曾國藩、左宗棠、李鴻章諸人，都手握重兵，分膺疆

寄，會國藩雖以避嫌忌諱，在克復金陵後，立即解散湘軍，但湘淮兩軍，會李兩家原屬一氣，代與的淮軍，還是曾氏勢力的保障。至於淮軍之爲李鴻章個人的勢力，左宗棠之威震西陲，更不用說。此時將帥間，雖然沒有爭權競勢之風，而兵權在握，國家實權已操在這班所謂中與名臣的漢人手中。故清廷每遇國家大事，自不得不向他們徵求意見，於是中央政府大權，逐漸的旁落，地方的權力，一天天的加重，中央集權的政治，便漸漸的轉到地方分權上去。後來庚子義和團之役，袁世凱、劉坤一、張之洞等東南疆吏，不奉朝命，與八國聯軍訂立東南互保的條約，便是近代中國中央集權勢力的沒落，與地方分權勢力的第一次抬頭；而其導源，已起於太平天國戰役時期。」

胡哲敏氏在其所編之會國藩一書中亦言之，如謂：

「在離開我們現在一百二十幾年以前，湖南湘鄉地方，誕生了一位時代英雄。自從他任用之後，中國政權，才漸漸地由滿人手裏轉移到漢人手裏。清朝壽命，因之延長了六七十年。中國近來一切新興事業，也都在他手裏種下了一個小小的根基。這人的確要算中國近世史上一個轉樞的人物。他是誰？便是本書所要說的會國藩。」

何貽燠氏於其所著會國藩評傳中，於曾氏對於當時及後世之影響，亦有敘述。如謂：

「曾公之思想，每隨時隨地而轉移，此足見曾公常受時代環境之影響。惟曾公亦能濶其道德才智，轉變當時之風氣，造成中興之局面；甚且影響後世之政治軍事教育文學，此足見曾公亦能影響時代與環境。人物與時代，乃交相影響，時代固能限制人生，人生亦能創造環境，於此不啻得一良好之證明。」

曾公對於後世之影響，就軍事方面言之：固在養成湘人從軍尚武之風氣，尤在不滿八旗綠營之所爲；一手創辦湘軍與淮軍，爲清代兵制變遷史上開一新紀元。就政治方面言之：固在平定洪楊，中興清室，以及清廷重用漢人，開放政權。惟其替代人物李鴻章支撐清室殘局數十年，所有內政外交之方略，一秉曾公遺意；似亦不無重大之影響。就教育方面言之：如派人留學，雇人譯書，以及開設學堂，教授西學，固爲中國近代

新教育啓其先聲；即就其所作勸學篇觀之，亦能注重道德教育與政治訓練，爲世人掌教之人，求學之士，另闢途徑。就文學方面言之：其詩其文，固能自成一派，影響後學，即其對於文學之見解，亦能推陳出新，啓示來茲。周作人先生以爲近年之新文學運動，實受桐城派人物之影響，即其明證。」

於此可視湘軍崛起以後，雖未革滿清之命，已取其實權而代之，爲滿漢勢力消長之重大關鍵。所謂清帝清后云者，不過徒有其名耳！以視徒喊口號，虛張聲勢，擺敵人之怒，而不能收實際之效果者，其相去爲何如耶？

辛亥八月十九日，革命軍起義於武昌，不一月間，湘、陝、贛、晉、滇、皖、蘇、黔、浙、桂、閩、粵、魯等，十三省相繼宣佈獨立；斯固由於總理暨革命先烈及當代革命元勳，奔走呼號，百折不撓，所倡導之革命主義，深入人心，有以致之。抑亦因湘軍崛起以後，封疆大吏，悉半均由滿人轉移與漢人，兵權在握，故於革命軍武昌起義後，迫於民族大義，聞風響應也！

三 培植淮軍使重心轉移避免清廷之嫉視

曾氏於平洪楊時，屢建大功，不僅爲滿人所駭懼，且爲漢人所嫉妬，尤以山西祁德、江蘇翁心存兩大學士爲尤甚。如祁德在咸豐面前謂：「國藩以匹夫居鄉里，一呼而從者萬餘人，恐非國家之福。」迨其平洪楊以後，兄弟開府，並握兵權，勢力傾中國，部曲漫各省，清廷對彼防閑，更與日俱深。聞彭玉麟嘗馳函諷勸曾氏，略云：「東南半壁無主，獨無意乎？」曾氏躊躇數日，而未敢置答，其弟國荃，亦有勸其取清而代之意。曾氏自審其政治生命，已達飽和點，夙夜惴惴，念念不忘者，厥爲如何保全晚蓋。咸豐遺詔，無論何人，克南京封郡王，而曾國藩僅得封一等勇毅侯，曾國荃、李鴻章、左宗棠皆爲一等伯。清廷對漢族之歧視猜忌，曾氏非不深知。若於此時不審慎考慮，爲策萬全，第憑一時情感所驅使，卽有殺身滅族之虞。爰培植淮軍，使重心移轉，避免清廷之嫉視，蕺其未竟之志。觀黎庶昌氏在其所編之曾文正公年譜中，載有：

「同治元年，公五十二歲，正月二十四日，李公鴻章募淮勇到安慶，公爲定營伍之法，器械之用，薪糧之數，悉仿湘勇章程，亦用楚軍營規以訓練之，撥湘勇數營以助之，兩省將卒，若出於一家，然公所敬也。同治三年，公五十四歲，七月二十九日，公奏稱湘勇招募之初，選擇鄉里農民，有業者多，無根者少，但餉欠餉有著，當可安靜回籍，昨奉諭旨，有挑補額兵一條，恐湖南之民，必不愿補三江綠營之額，臣以爲勇則遣回原籍，兵則另募土著，各返本而復始，庶經久而可行。十月初七日，李公鴻章委員解到上海協餉銀十七萬兩，支發江皖各路湘軍欠餉，公定議撤退湘勇什去八九。十七日，李公鴻章到金陵見公，公與商裁退楚軍，進用淮勇，撤調劉銘傳、李鶴章等引淮軍渡江而北，上援皖鄂。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奏剿辦捻匪，宜用淮勇，人地相宜。……楚勇必須多撤，金陵守兵，已裁去七千人，朱品隆、唐義訓、劉連捷等軍，應卽先撤。庶騰出有用之餉，以濟西征之師。

同治四年，公五十五歲。五月初九日，為定計撤退湘軍，遣周澹軍。勸留金澗、胡勇四營，增募千人，凡六營，委道員羅騰森等領之，以為親兵，隨同北征，其餘湘軍在江南者，全行撤退回籍。三日奏稱，潘鼎新一軍，由輪船馳赴天津，可以壯畿輔之威，可以補臣迂緩之過，目前局勢，似可無虞。至於節制三省，臣實不能肩此鉅任，即才力十倍於臣者，亦不必有節制三省之名。附片奏潘鼎新、劉銘傳、張樹聲、周盛波等四軍，皆係淮軍，經李鴻章兄弟苦心訓練而成者。」

是淮軍之成立，完全由於曾氏之培植。撤退湘軍，即所以進用淮軍，湘淮軍若出於一家，則又為曾氏所教成也。清代兵制，由旗兵、綠營演變為湘軍、淮軍，曾氏確有重大關係。吳汝綸氏於其所著之合肥淮軍昭忠祠記中嘗言之，如云：

「國家兵制，至淮軍凡三變，始者旗營之制，命將出師，取兵於素養。事定則兵歸伍，將歸京師。川楚之役，乘資召募，不專用額兵，變兵用勇自此始。粵盜起，大學生賽尚阿募潮勇擊賊，而江忠烈公以楚勇顯，聞潮勇不遵法度，難用，江軍能戰守，可用矣，亦以奔命燔。獨曾文正起湘鄉，教練鄉勇，倚以辦賊，號曰湘軍。湘軍興而舊時額兵盡廢，兵之制於是始變也。文正公之起湘中也，今相國合肥李公仍父子奏詔出治圍練淮南，江忠烈公之撫皖，文正公嘗貽書忠烈，言相國可屬大事也。是時相國以編修治軍，名位未顯，展轉無所就，及賻公歿，久之，遂棄淮南軍，從文正軍江西。同治元年，以文正薦，募淮南義勇六千五百人赴援上海，於是劉公銘傳、潘公鼎新、張公樹聲、吳公長慶等，各領數百人從，號曰淮軍。軍召募到皖，皖撫李勇毅公願宜，名為能選將，知軍勝敗。文正公使勇毅接視新軍，還賀曰：「皆勝軍也，吳平矣。」相國率軍至上海，凡二十九日，而吳果平。於是淮軍增至七萬人矣，吳平，曾文正公與相國定議，盡散湘軍，淮軍稍汰羸弱，留五萬人，備中原捻患，於是淮軍興而湘軍可廢。」

吾人於此文中，亦可窺見淮軍係繼承湘軍而代興，淮軍與湘軍廢，乃出於曾氏與鴻章定議之結果矣。曾氏高足李瀚章，嘗將其書札，編次成書，並謂：

劉營勇味傷鬪楊令一案，關係甚重，務獲認真查辦，宜獲一弁目，或殺賊勇，乃足伸法，斷不可敷衍了事。淮勇野氣未除，閣下須苦心教導，嚴法懲之，從前次青之於平江勇，一味寬縱，識者知其無能為。至丙辰三月，燒殺辰州勇二百餘人，次青不究，又庇護之，鄙人則深恨之矣。今日之與次青決裂，其禍尚伏於篋案，閣下設身以處，儼若代為楊令之尸親，而與銘營為仇，則足以服各官紳，而淮勇亦知畏懼矣。

皖北英靈之賊，已派萬人赴英，八千人赴徑，應是逼其東趨。惟湘勇強悍之末，銳氣全銷，力不足以制捻。將來截定兩淮，必須貴部淮勇任之，國藩丞持此議，幸閣下為證成此言。兵端未息，自須培養朝氣，滌除暮氣，淮勇氣力強盛，必不宜裁，而湘勇則宜多裁。頃舍弟沉甫部下已裁撤萬人，國藩擬於今冬明春共撤四五萬人，但善欠餉無着。前札劉、丁、潘、錢諸君，籌捐八十萬金，又欲與閣下商撥蘇滬釐金三成，釐餉可分若干，伏候裁示。捐務則志在必成，尙懇鼎力扶助。敵處若果裁撤四萬人，則除屬周兩軍，僅存江西半營外，以後當粗足自了。

九舍弟回籍一疏，仰蒙俞允，并荷溫綸慰問，珍藥下頒，感激曷已！現定於十月還滬，裁勇過二萬，無論何處銀錢，概儘遺棄，先行給放，欠餉不敷甚鉅，若今冬能勉強敷衍，則敵處人數漸減，餉源如常，明年或可漸入佳境。惟目下騰挪欠款，或用長沙期票，或用此間期票，屆時難踐成諾。來示許於蘇捐內分二三十萬洋見惠，尙嫌其薄，俟相見更當請益。鄂中兵事日壞，珂鄉難望安枕，貴部留以釐定兩淮，切勿輕議裁汰！湘勇則銳氣銷滅，倦飛思還，稍有多餘，續即裁撤，此鄙人確有所見，幸垂采納！

湘勇早已定議，全數遣散，因遣資未備，又挑秦淮淤土出城。土工甚鉅，尙未裁遣，今聞此信，畏縮不顧北征者，十人而九，勉強派去，終屬難督之末，難期於力。貴部淮勇銘、盛、濟各軍，平日頗有一家之

隨，不識離蘇赴齊，尙能心性相孚否？擬約季泉幼泉同往相助，祈閣下於竹報中一爲勸導！

自奉山東之命，因湘勇在金陵者，人人思歸，不願北征，久未復奏，本日始具疏復陳，鈔稿呈覽。甫經出發，又接奉初四夜諭旨，令國藩繞赴山東，節制直、東、河南三省，敵軍迂緩異常，而北路望援，急於星火，賤軀頹德已極，而復假以極重之事權，其不至絕續頹厥者幾希。貴部銘、盛、樹三軍，自須資爲干城腹心。……國藩帶金陵數營隨行，其中良者多已先歸，此皆替代暫署，鱗爪僅存。頃檄調劉松山由甯國來金陵，易開俊亦有稟來告請隨征，二將差強人意，其部勇願北征與否，尙未可知。湘軍銳氣久滯，真強弩之末，與承示代練千人，佐我征調，感甚感甚！徐州四戰之地，古多豪將健勇，與魯處風氣相近，若能化其梟悍之習，導以忠樸之風尙，淮勇之波瀾彌闊，枝落彌茂矣。閣下獨無意乎？

淮軍隊伍之整，器械之精，迥非各部所及，惟驕於擊敵之心，蕪之甚堅，又於聖人臨事好謀之訓，不甚厝意。欲抑之則恐餒其氣，求閣下善爲勸誡，俾諸統將皆沈慎好謀，而氣不少減，則妙矣。

淮勇自成軍後，多遇順境，未經大挫，未殉奇節。不因阨則不能激，無詆毀則不自憤，原閣下憤之、激之、禁之、教之，俾諸統將磨折稍多，成就更大，而鄙人藉以少靖捻氛，免於咎責，受惠多矣。

後路餉項，接兩生信，言中丞甚有難色，計明春必不若今年之充裕，然使蘇境有可生發，鄙人猶能設法提用，所慮者羅掘殆盡耳。閣下幸無以後路爲慮，專殫心於前敵，第一貴忍辱耐煩，次則貴得人和，淮軍與各省之軍宜和，淮軍與淮軍尤宜和協，無纖芥之嫌，不惠剿辦無起色。

來示謂中外倚鄙人為砥柱，僕實視淮軍閣下為轉移，淮軍利，閣下安，僕則砥柱也；淮軍鈍，閣下危，則僕蠶卵也。

尊處少一奏疏好手，茲有薛撫屏福成者，貴同年曉帆之子，工部員外，供職多年，會試後因貧告歸，學問淹博，事理通達，用特薦至尊處，作為奏疏幫手，雖渠於奏牘，素非所習，然輩行較晚，心懷虛受，閣下隨時訓迪，數月後，必可脫手為之。三年之艾，貴及時而早蓄，憑依之雲，在隨氣而自為，已令趨謁左右，知必邀青睞也。

接中元日惠書，具承一切。協揆酬庸之僉，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，此間朋好，多以李府之登庸，為曾氏之大慶，紛紛來賀，斯亦一時之佳話也。自去秋以來，波瀾迭起，疑謗不搖，寵辱不驚，卒能艱難存折，了此一段奇功，固自可喜，德量尤為可敬。從此益宏偉度，渾涵圭角，有忍有容，退藏於密，古人所稱動績蓋世，而人不忘，庶近之矣。

內人病已兩月，勢殊沉重。國藩擬於二十五日起行，擬在下關以下，燕子磯以上，停泊二三日，乃可長行。開台從於日內可至漕江，欲相聚為三日之談，不願在城內繁囂之地，或在燕子磯，或在瓜洲三汊河舟次，較為清曠。而僚屬之迎送吾二人者，亦尚方便，請閣下於二者之中，酌定一處，迅速見示。在燕子磯則僕少延候，在三汊河則閣下少為延候。

國藩本擬於二十五日成行，在於草鞋夾舟次，與閣下暢談數日。近與幕僚熟商，下關以下，並無街市，吾二人停泊該處，而文武百僚，皆須枉手伺候數日，非所以示體恤，而馬帥及司道大員，亦不免牽率遠行，

心殊不安。茲僕改於十一月初四日啓行，計二十四五郊迎自滿，可爲握手十日之歡。賤內病尚未痊，與專船接費伯雄，渠尙在滬未歸也。

僕定長江章程，所以籌諒以不許登岸爲第一義者，正以江楚之人，不常舟居，不能涉海故也。縱使輪舟果極精堅，若吾三江兩湖之將士，不能履海洋如枕席，終不能保長江之險要，不能防江蘇之浮面。欲令將士履海洋如枕席，須先令住江船如室家，此國藩微意之所在。……閣下議覆江蘇水師長江水師章程，請從此處著眼，否則一旦有事，俟與閣下實無可辭，屆時再求江楚之將，御海之士難矣。略陳愚見，尙望閣下任其事而掩其迹，宏其規而密其思，幸甚！

直督職應練兵設備，義難可辭，特鄙人暮年弩末，又無可恃之統將，自度之自強之道。故去秋竊論以六軍之去留，待僕而定，至今尙未覆奏。在京稍察物情，於閣下均無間言。申夫平日自命專從愛民上致力，到湘後拂亂若此，近日如渠及勸仙，均足見僕知人之明矣。

直隸練軍之舉，於原留四千人外，又令傅軍門於古北口，彭楚漢於保定，譚勝達於正定，各練千人，漸上兇戲，斷不足恃。茲恐銘軍遠行，擬令彭讓各招練馬勇五百，未知足制突起之士寇否？厚菴遠訪秦鑑郭樂山，曾於夔府見之。據云，乘扁舟而往，非徒步也。春霆英風壯氣，自是一時名將，然使專制一路，用人理財，操持全柄，尙須非其所勝。若歸閣下節制，閣下統全軍由湘入黔，雲領偏師由蜀入黔，糧飽藥械，皆由尊處籌備運解，或不至於債事。」

其所以訓誨鴻章，使其沈慎好謀，成就遠大。勦勉淮軍，波瀾彌闊，枝葉彌茂，而成爲勁旅者，可謂無微不至。厥後雖軍平捻匪，定中原，中外係曾氏爲砥柱，曾氏則藉鴻章淮軍爲保障，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爲曾門

之大慶，曾李同氣，湘淮一家，斯固出於曾氏所預計也。遣散湘軍，謂爲「銳氣銷滅，倦飛思還」，堅囑鴻章，淮軍留以鎮定兩淮，切勿輕議裁汰，其言至堪玩味。蓋謂「三年之艾，貴及時而早蓄，憑依之雲，在嗷氣而自爲，有忍有容，退藏於密，動積蓋世，而人不忌，任其事而掩其迹，宏其規而密其思。」則其深謀遠慮，如見其肺腑矣！謂鴻章「閔才遠志，自是匡濟令器，在京稍察物情，於閣下均無間言」，而以直隸練兵之責屬之，亦可見其對鴻章倚畀之深，付托之重之一斑。曾氏幕中，人才輩出，廣包兼容，規模宏闊，薛福成嘗爲文敘之，分閔偉、明練、淵雅、雄略、碩德、清才、雋辯、古文、閱覽、樸學、勤樸、敏瞻等十二項，而以鴻章莫然冠首，並謂「李公功最高，公（指國藩）之志業，李公實繼之，亦豈無故哉？」薛福成氏在幕所著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一文中，又謂：

「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，始以丁未翰林供職京師，其封翁愚荃先生，與曾文正公戊戌同年也。傅相未第時，嘗以年家子從文正著制舉文，旣得翰林，亦常往問業。……」

傅相入居幕中，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，而江南北風氣，與湖南不同，日食稍晏，傅相遂欲不往，一日，以頭痛辭，頃之，差弁絡繹而來，頃之巡捕又來，曰：「必待幕僚到齊，乃寢。」傅相被裘踉蹌而往，文正終食無言，食畢，舍箸正色謂傅相曰：「少荃！旣入我幕，我有言相告，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。」遂無他言而散，傅相爲之悚然。蓋文正素矜傅相才氣不羈，故欲折之使就範也。傅相初筆書記，繼而批稿奏稿，數月後，文正謂之曰：「少荃天資，於公腹最相近，所擬奏咨函批，皆有大過人處，將來建樹非凡，或竟善出於畫，亦未可知。」傅相亦自謂從前歷佐諸帥，並無指歸，至此如識南鍼，獲益非淺。旣而文正進駐祁門，傅相謂祁門地形如登釜底，殆兵家之所謂絕地，不如及早移軍，庶幾進退裕如。文正不從，傅相復力爭之，文正曰：「諸君膽怯，可各散去。」會皖南道李元度次青，率師守徽州，遣文正節度，出城與賊戰而敗，徽州失陷，始不知元度存亡，久乃出詣大營，又不留營聽勸，徑自歸去。文正將具疏劾之，傅相以元度嘗與文正同患難，乃率一幕人往爭，且曰：「果必奏劾，門生不敢擬稿。」文正曰：「我自屬稿。」傅相

曰：「若此，則門生亦將告辭，不能留待矣。」文正曰：「聽君之便。」傅相乃辭往江西，閒居一年。適官軍克復安慶，文正移建軍府焉。傅相馳書往賀，文正復書云：「若在江西無事，可即前來。」傅相乃束裝赴安慶，文正復延入幕，禮貌有加於前，軍國要務，皆與籌商。明年，吳中紳士僱輪船來迎援師，文正奏遣傅相募淮軍赴滬，而密疏薦其才大心細，勁氣內斂，可勝江蘇巡撫之任。抵滬未及一月，奉命署理江蘇巡撫，練兵選將，克復蘇常嘉興等郡，遂實授巡撫，加太子少保，……封一等肅毅伯，勳名幾與文正相並，距出幕府時僅逾兩年耳。未幾續望日隆，卒戴文正未竟之緒，文正之志業，傅相實繼之。同治十一年，文正薨於兩江總督官廨，傅相郵寄輓聯云：「師事近三十年，薪盡火傳，築室忝爲門生長；威名震九萬里，內安外攘，曠世難逢天下才。」蓋紀實也。」

是亦可見李鴻章不僅爲曾氏入室弟子，且於門徒中稱巨擘焉。鴻章才氣不羈，折之使其就範，初掌書記，繼司批稿奏稿，再次凡軍國要務，皆與籌商，又次奏遣募淮軍赴滬；並密疏薦其任江蘇巡撫，皆其一手所提拔。而終以戴曾氏未竟之緒，繼其志業，使其薪傳而不墜也。梁任公氏亦嘗於其所著飲冰室文集中，將曾李相提並論，其言曰：

「李鴻章之於曾國藩，猶管仲之鮑叔，韓信之蕭何也。不啻惟是，其一生之學行見識事業，無一不由國藩提撕之，而玉成之。故鴻章實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。曾非李所及，世人既有定評，雖然，曾文正儒者也，使以當外交之衝，其術智機警，或視李不如，未可知也。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，常以急流勇退爲心；而李則血氣甚盛，無論若何大難，皆挺然以一身當之，未嘗有畏難退避之色，是亦其特長也。」

蔣廷黻氏在其所著中國近代史大綱中，亦謂：

「湘軍既充滿了宗族觀念和家鄉觀念，兵士祇知道有直接上級長官，不知道有最高統帥，更不知道有國家。某回曾國荃回家鄉去招兵，把原有部隊交曾國藩暫時管帶，這些部隊就不守規矩，國藩沒有法子，祇好催國荃趕快回營。所以湘軍是私有軍隊的開始，湘軍的精神，以後傳給李鴻章所部的淮軍。」

更可見李鴻章之密切，鴻章之成就，得由曾氏提擢之，而玉成之。所謂之淮軍，即繼承湘軍之精神也。何 焜氏於其所編著之曾國藩評傳中，亦謂曾氏對中國政局之影響，不僅及身而已。其言曰：

「李公鴻章，嘗支持中國政局數十年，而李之謀畫策略，以及立身處世之道，多繼續曾公之精神，則曾公對中國政局之影響，不僅及身而已，固甚昭昭也。」

其所以進用淮軍，不得不遣散湘軍之原因，曾氏本人於致李鴻章書中，亦嘗道及。茲摘錄如次：

「閣下名位鼎盛，竊謂帶兵與百姓交接，擇術不可不慎，善於用獎，不如善於用激也。舍阮弟并無引退之志，不過因家門過盛，才薄位高，夙夜祇懼，思以閒散效力軍中，惟事局尚在艱難之際，尊處亦難於措辭，自可置之不議之例。」

自台從東下，提別以後，此間選將整軍，用人治財，都乏實際，虛構之象，日甚一日。長江三千里，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，外間疑敵處兵權過重，利權過大，蓋謂四省蘆金，絡繹輸送，各處兵將，一呼百諾，其相疑良非無因，而兵弱餉絀之實情，乃無一人得知。擬即日將辦理踴躍之概，一一上疏直陳，請將欽篆次第交出，而鄙人亦不敢置身事外，但僅統兵萬餘，專辦一路，如昔八九年等規模，或可免於大戾。

尊處既以郭劉四鎮直擡中堅，而又以張樹聲等并力東路，劉銘傳等并力西路，敵處應辦之廣德州，亦蒙大力相助，再接再厲，片刻不自休息。既欲閣下之志蓋闊遠，而又私幸下走創立淮勇新軍，正所以濟湘勇之窮，而為鄙人彌縫無限之缺憾也。

敵處覆奏之疏，昨日已出，於各事似尚不觸不背，鄙人於江督星使協辦三缺，決不肯以病軀尸位其間，故開缺之請，即十疏不獲，而請之彌堅，雖接縫而不顧。此外更求有益於大局，無損於尊處之議。摺末所請

三事，自以閣下薦賢籌餉布置後路為妥，如以令兄小兒調攝，或再坐署蘇撫，而壽廷屢讓，雖全轉淮軍，不作別用，當亦稍可敷衍。照料之說，不過以留賢自效，藉塞滯議，其實不主調度資糧之權，即全不預矣。閣下接辦，僕固無不放心之處，即他人接辦，僕又豈肯以故將軍更授臂而越俎乎？總理衙門連來三咨三信，國藩既不回任，全數移交尊處接辦，此兩三月之內，閣下既專征之命，料簡出省事宜，而又有洋務吏治鹽政三者，萬端瑣委，想見日夜勞勩，然鄙人內度病軀，外畏人言，勢有不能代閣下分勞者，乞亮之也。

接惠書，股股纏綿回任金陵，於國藩私計甚便。惟作臬使，則告病甚重，即金陵則痊癒甚速，此非取巧而何，豈能不為一二有識者所笑？且不能多見賓客，多閱文牘，此自知最明，亦閣下所深知者。僕辛苦多年，何必於晚節戀此一官，致損物望。現雖奏明由徐接印，而三月必奏請開缺，從此不居極要之任，或可保全末路耳。至閣下既赴前敵，僕在徐州，必將後路妥為照料，俟會晤商定，再行密奏。

頃接惠書，論建軍及西北事，均得專理之平。惟國藩既度才力，萬不能願晉秦，並不能籌直隸，曾經五次具奏，去冬以來，屢議長議，尤甚於昔。覺吾二人可不願陝西，而不能不願山西，賊一至晉，則京師震恐，吾二人同為世唾罵。

兩月以後，軍勢稍振，令兄已履署督之任，大纛再移宅處，吾兩家門第最盛，近舍弟軍敗名減，僕亦屢挂彈章，一門有衰替之象。德門值鼎隆之時，亦宜平不忘險，安不忘危，願閣下訓飭諸弟，以習勞崇儉為第一義。……晉事誠如人意，聖鑒而善不傷，然吾輩久處高明，瞰室者愈衆矣。」

由此諸書以觀，更可見曾氏之意志及其所處之環境矣。因兵權過重，利權過大，家門過盛，故夙夜祇懼。

憂讒畏譏，不居極重之任，以冀免於大戾，保全末路也。錢穆氏於其所著國史大綱中，亦嘗言之，如謂：

「曾國藩於洪楊平，即亟亟謀遣散湘軍，以淮軍自代，曾胡皆善處當時之變局，以自成其所欲達之目的。……曾氏對當時朝政，極抱不滿，然方其在翰林爲部臣時，尙敢稍有論列。其後出外操提軍權，因種種牽掣顧慮，對朝政即嘿不發言，一意以平亂爲主。逮亂平以後，畏讒避謗，急流勇退，遣散湘軍，以淮軍代之，平捻之任，交付與李鴻章，如江南製造局、譯學館、及派留學生等，只就疆吏可辦者辦之，於朝政綱領，更無獻替。其資條亦極少爲清廷重用者。」

韋息予氏在其所著之李鴻章一書中，則謂：

「太平軍的突起，與捻匪的橫行，豈然不是清朝的威力所能剷除。湘軍和淮軍，表面上雖奉清朝之命而行征伐，實際上已是一種新興的軍事勢力的活動了。曾國藩李鴻章之輩，本有把清朝與太平軍捻匪等，一起吞滅而自立新朝的資格，只因他們篤於綱常名教的士大夫，所以把太平軍捻匪撲滅之後，成了清朝的中興名臣。……清朝本身，雖沒有什麼實力，但名義上總是居於統治的地位。本身沒有實力，而居於統治地位，對於功臣的嫉忌，必然很甚。曾國藩言創湘軍，討滅太平天國，勞苦功高，僧格林沁死後，事勢上不能不把平捻的任務付託給他，然而在清朝便不免有所嫉忌。曾國藩是一個純正的士大夫，處於這個時代，這種地位，乃不得不存持盈保泰之心，而以此平捻之功，讓給後起的李鴻章。又自知其湘軍暮氣漸深，誠恐稍有疏失，損及令名，所以漸將湘軍遣撤，而惟用淮軍當前敵。曾國藩的如此做法，是爲着順應時勢。……

當剿辦期內，淮軍的後援糧運，源源不絕，既全仗曾國藩的維持，而剿捻的根本計畫，確定不變，亦大有賴於曾國藩的調護。所以李鴻章的平捻之功，可算是曾國藩所玉成，時勢使曾國藩不得不取持盈保泰的態度，而竭力贊助後起者。」

是尤可以證明曾氏之遣散湘軍，起用淮軍，是取持盈保泰態度，防清廷之嫉忌，使其轉移目標，順應時勢，有不待已之苦衷。而湘淮軍表面上雖奉清朝之命，實際上是一種新興軍事勢力，乃係抑滿扶漢，深具民族思想

者矣！夫鴻章漢人也，淮軍全體將士，均漢人也，使曾氏果有扶滿抑漢之意，則必整頓旗兵，培植滿清親貴矣！此尤理之最顯明者。乃曾氏獨訓練鴻章，使底於成，進用淮軍，繼湘軍之志業，故吾謂其非扶滿抑漢，深具民族思想者也！

四 淮軍演變爲北洋軍 戴湘軍未竟之志

曾氏既將湘軍遣散，進用淮軍，使重心轉移，避免清廷之嫉視矣。淮軍首領李鴻章，爲曾氏入室弟子，曾氏志業，李氏繼之，故亦效師之所爲，培植袁世凱，使其訓練新軍，成爲勁旅，繼淮軍志業，戴湘軍未竟之緒焉。

袁世凱於光緒六年，入慶軍（淮軍之一部）吳長慶幕府。光緒八年，隨吳赴朝鮮，爲李鴻章所賞識。光緒十一年，中日天津條約成立後，李鴻章保薦袁以三品銜道員，駐紮朝鮮，總理交涉通商事宜。光緒二十一年，中日和議既成，袁以浙江溫處道留京，充督辦軍務處差委。旋李鴻章等奏請變通軍制，在天津新建陸軍，保薦袁世凱督練，就袁固有之定武軍十營，加募馬步各隊，湊足七千人，依其所擬營制餉章編伍辦理，俟有成效，逐漸擴充，奉諭照准。又奏請派遣員蔭昌挑選八旗精壯子弟，附入天津武備學堂（由曾國藩李鴻章所設立，袁之將屬多由此出身）爲預備將校之用，與袁督練陸軍相依附。定武軍本駐離津七十里之新豐鎮，卽津沽間所稱爲小站也。（昔爲淮軍駐所，且辦屯田，淮軍散後，成爲廢壘。）袁受委後，依其所擬計畫進行，所用將校人員，一部份爲其宿將，一部份則爲天津武備學堂畢業學生，此卽所謂小站練兵及新建陸軍也。光緒二十五年，袁任山東巡撫，除將所練之新建陸軍（時已改稱爲武衛右軍），均帶往山東外，並將山東原有勇隊挑選裁併，編爲二十營，奏請改稱武衛右軍先鋒隊，以新軍人員居中訓練，袁之軍隊實力，遂又擴充。會將魯省境內拳匪，完全趕出。因此外人亦爲之稱贊。拳亂既作，魯境安謐，直省避難人民，紛往山東，匪軍到達德州境界，卽不敢再進。李鴻章奏袁曰：「幽薊雲擾，而齊魯風澄。」自是袁之聲望益著矣。光緒二十六年，袁奉諭調新建陸軍入京，時東南各督撫，亦有主張「袁慰帥卽由山東提兵，由保定進京，以清君側，讓兩宮爲要議者。」上而袁將所練軍隊一部份，開到直魯邊境各處，卽中止前進。後有人責其擁兵自重，不肯赴難者。實則袁果提兵

北上，必遭無謂犧牲也。

自咸同以來，兵權寄於各省督撫，直隸總督，尤為軍權所寄之重心。因自李鴻章督直兼北洋大臣後，盡力經營北洋軍備，而直省又為皇畿所在。故直督之地位，比其他各督撫尤為重要。中日戰爭，李鴻章受輿論指責，直督遂由王文韶、榮祿、崧祿先後繼任。迨拳匪亂作，崧祿死於聯軍，清廷無法收拾，復授鴻章以直隸總督。李於臨逝前一日，口授于式枚草遺疏，保薦袁世凱繼任直督，謂「環顧宇內人才，無出袁世凱右者。」清廷亦以除袁以外，一時不易有適當人才，遂授袁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。此為北洋軍之由來，亦即北洋軍奠定基礎之時也。蔣廷黻氏在其所著中國近代史綱中，嘗謂：

「湘軍是私有軍隊的開始，湘軍的精神，以後傳給李鴻章所部的淮軍，而淮軍以後又傳給袁世凱的北洋軍。」

章息子氏在其所著李鴻章一書中，亦謂：

「李鴻章臨終前一日，即命人起草遺疏，保薦袁世凱為直隸總督，有二環顧宇內，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」等語。次日發布上諭，……依其遺疏所奏，立即任命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，於是此一代風雲人物，與世長辭，由其一手養成的袁世凱，承受衣鉢，而漸成北洋軍閥的大首領。」

於此可見北洋系勢力之起源，以湘軍為起點，清代軍制之改革，亦以湘軍為轉變之關鍵。袁世凱之成就，由於李鴻章之陶鑄，李鴻章逝世後，即由袁世凱繼承其勢力也。清史稿兵志，對湘軍演變經過，曾有記載。而羅爾綱氏在其所著太平天國史綱中，亦謂：

「繼湘軍而起的淮軍，本由曾國藩所手創，其營制乃一依湘軍。即當日湘淮軍外，其他勇營，也紛紛摹取湘軍營制，倣照湘軍的組織，故到太平天國覆滅及捻匪平定後，由湘淮軍改編成為防軍，便代替了綠營。」

不但防軍為湘淮軍的轉變，即所謂練軍，雖在綠營內選擇訓練，而其營哨餉章，悉準湘淮軍制，與防營

同。其屯聚以散爲營，重在防守要地，其用也與防軍同，而與綠營分布列郡沉地的防守制度異，故練軍亦防軍也，就是以湘淮軍轉變而來。……自同治以後，綠營兵屢加裁汰，綠營制度遂同虛設，國家衛戍之責，遂專屬於防練軍，其後防練軍雖改爲巡防隊，又再改爲陸軍，而要其源，都從湘淮軍遣一個系統演變下來。所以論有清一代的軍制，當以湘軍爲轉變的關鍵。湘軍既代替了綠營，湘軍的制度，代替了綠營的制度，於是清代的兵制，便起了根本的改革，結果便造成了後來軍閥勢力的起源。……

從前本是國家的軍營，而容便逐漸地從國家的轉到私人的手中去了。……後來李鴻章老死，袁世凱承繼他的勢力，幸移清祚。故論北洋系勢力的起源，以及民國以來軍閥的據地自雄，造成割據局面的由來，實以湘軍對綠營制度的改革爲起點。而湘軍之興，則由於太平天國戰役時勢所造成。」

綜而觀之：由湘軍而淮軍，由淮軍而北洋軍，無往而不見其蛻變之迹焉。考清代之兵制，自嘉慶以後，旗兵綠營，皆已廢散，故川楚教匪之亂作，清政府不得不另募鄉勇。太平軍興，亦賴曾國藩等所募集之湘勇、淮勇，討平後，湘軍自動解散，淮軍遂成爲全國兵力之重心。迨中日甲午戰爭後，袁世凱訓練新軍於小站，卽所謂北洋軍也，遂代淮軍而爲全國兵力之重心。故清末之陸軍，由湘軍而淮軍，而北洋軍，雖分三大重要階段，則實一脈相傳也。

五 辛亥武昌起義北洋軍與革命軍合力推翻清室

關於滿清之顛覆，及民國之成立經過，時彥所著之近代史，均有紀載，或詳或略，雖微有出入，而其重要事實，則大致相同，茲將北洋軍與革命軍合力推翻清室者，摘述如次。

辛亥八月十九日，革命軍（亦號民軍）起義於武昌，推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爲都督，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爲總參議，即以諮議局爲軍政府，出示安民。復照會駐漢各國領事，各領事會商結果，當即承認爲交戰國，發表嚴守中立宣言，對於兩方戰爭，不作干涉，亦不補助任何方面之表示。二十一日，清政府諭令瑞澂張彪率職留任，湯罪圖功，一節命陸軍大臣蔭昌督兵兩鎮，前往湖北，海軍提督薩鎮冰督兵艦，長江提督程允和督水師赴援，並停止秋操。又命各省緩裁綠營巡防隊。二十三日，忽下諭起用前軍機大臣袁世凱爲湖廣總督，以岑春煊爲四川總督，均督辦剿撫事宜。初，袁尙以足疾未痊力辭，以待其事變擴大，經徐世昌親往彰德勸駕，及清廷再三催促，始提出六項條件，須清廷悉行允諾，始允出山。條件原文如下：

一、明年即開國會。

二、組織責任內閣。

三、寬容參與此次事變的人。

四、解除黨禁。

五、須委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制的全權。

六、須予以十分充足的軍費。

袁世凱對袁所提條件，初本不願接受，如不接受，則袁亦不允出山，南下之北洋軍均爲袁之舊部，陸軍往來於備陽孝感間，將校不相習，軍心不固結，以致遷延無功。至九月六日，湖南、陝西、九江已響應革命軍，歐

邊荒能，乃於八日下諭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，節制各軍，以海國總統第一軍，段祺瑞統第二軍，召薩昌回京。時南下各將士，聞袁有出山意，行將南下，始奮力與革命軍奮戰，而漢口復為清軍所有。適第二十鎮統領張勳曾與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等，奉命由奉天調赴前敵，至漢州電奏要求實行立憲，憲法由議院制定。陸軍第二十鎮，係光緒末年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時，由北洋六鎮中抽調編成帶出之第一混成協，於宣統元年，由錫良改為第二十鎮，其將校頗多袁之舊屬及革命黨人。故張勳曾等探漸進手段，屯兵灤州，向清廷提出最高度之立憲條件，以示威脅也。曾山西響應獨立，於是載灃於九月初九日，即下詔取消現行內閣章程，改組內閣，命資政院立即起草憲法，籌備憲法，認革命黨為正式政黨，並下罪己詔，獎勵內閣於十一日解職。十二日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，於三日召集政院即將憲法重要信條十九條，議決奏上，載灃即命刊刻謄黃宣布，擇期宣誓太廟，袁世凱始於廿一日由彰德南下視師。時距武昌起義二十餘日，革命軍已占領境之大半。九月十八日，資政院依據新頒憲法信條，實行選舉內閣總理大臣，袁世凱當選，清廷即依法重行任命。二十一日，袁在孝感軍次，接到授任內閣總理諭旨，尚電辭不就，清廷再三電促，乃於二十三日率衛隊入京，二十六日袁組織之內閣成立，閣員名單如下：

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

- 外務大臣梁敦彥 次官胡惟德
- 長政大臣趙秉鈞 次官烏 珍
- 度支大臣嚴 修 次官陳錦濤
- 陸軍大臣王士珍 次官田文烈
- 海軍大臣薩鎮冰 次官譚學儔
- 學部大臣唐景崇 次官楊 庚
- 法部大臣沈家本 次官梁啟超

郵傳部大臣唐紹儀 次官梁如浩

農商部大臣張 謇 次官熙 霖

理藩大臣達 壽 次官榮 勳

袁除組織責任內閣外，並取得節制調遣近畿各鎮及各路軍隊之全權。軍諮府之載瀾罷去，代以蔭昌，又代以徐世昌。及內閣成立，清廷之實權，已完全落於袁手。未幾監國攝政王載灃以醇親王名義退歸藩邸，又以大義諷令載灃率師禁衛軍實行出征，載灃聞革命軍蜂起，早已落膽，遂自請解除管轄禁衛軍之職權。袁即調用滿圍璋為禁衛軍總統官，將武漢方面任務，全授段祺瑞。稍頃，即以準備出征名義，將禁衛軍調出北京城外，而以新編之拱衛軍拱衛宮城，於是清廷一切自衛之壁壘，盡行撤毀，祇留下孤兒寡婦，被袁世凱完全所玩弄矣。

又袁世凱於九月十一日南下，十六日接清廷停止進攻之諭旨，即命劉承恩兩次致書黎元洪勸和，黎置不答。二十一日乃命蔡廷幹偕劉承恩同赴武昌晤黎請和，時宋教仁亦到武昌，黎因與宋等同接見蔡劉，拒絕和議，並請勸倒戈北伐，任革命軍汗黨都督，此為和議最初之發端。時南京尚未光復，漢陽亦未失去，袁知武漢方面民軍之重心，已在黃興，因又曾秘令其子袁克定赴漢陽與黃有所接洽，應然表示共同行動。黃與不欲示弱，袁亦知民軍氣勢方盛，不易講和，因於北上退關時，傳命猛攻漢陽，予民軍打擊，再提和議。至十月初七日，漢陽失守，清軍若乘勝猛撲武昌，則後來之事，殊難逆料。袁世凱乃請英公使朱爾典，請其介紹和議，朱爾典因即電訓駐漢英領事，向兩方介紹議和，此為和議第二次之發端。迨十月十一日，南方無條件停戰，初以三日為期，三日期滿，又延長十五日。十月十五日，袁世凱提出交涉條件，電達漢口，北京不遣兵向南，南軍亦不遣軍向北，派唐紹儀為代表，民軍代表伍廷芳，議和地點為漢口，是為正式和議之開始。

方總理未歸國時，革命軍所佔地，已有中國之大半，目的固屬一致，進行殊多歧異，於是江蘇都督程德全，浙江都督湯壽潛，於九月二十一日聯電滬督，倡議各省公舉代表，集議上海。二十二日，即以江蘇都督府

代表雷奮沈恩孚，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爾登之名義，電各省代表，至滬會議，組織臨時政府，並請各省公認伍廷芳等爲臨時外交代表，是爲各省民軍組織臨時政府之始。九月二十五日，代表會開第一次會議，議決定名爲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，（中略）十二日，選舉雷奮、馬君武、王正廷爲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起草員。又議決如袁世凱反正，當公舉爲臨時大總統。十三日，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，並即日宣布之。（中略）十一月九日，開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，十日，開正式選舉會，到奉、直、豫、魯、晉等十七省代表，總理當選爲臨時大總統。十一月十三日爲陽曆一月一日，總理即於是日就任；尋又選舉湖北都督黎元洪爲臨時副總統。

既而清內閣總理袁世凱，聞南京民國政府既成立，唐紹儀等所議國民會議召集方法又不合，大感不快，遂撤銷唐紹儀議和全權代表，致電伍廷芳，所有應議事件，直接與清內閣電商。和議因以停頓。在初十以前，不惟唐伍之間，已意見一致，要袁共同盡力消滅滿清皇位，而以總統地位爲酬；即總理與袁亦均默許，故總理於就任總統後，立即電袁表示，待滿清皇位推翻，即以總統之位置相讓。袁仍不置信，故總理又覆袁電云：

「袁慰亭君鑒：鹽電悉，文不忍南北戰爭，生靈塗炭，故於議和之舉，並不反對。雖民主君憲，不待再計，而君之苦心，自有人諒之。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，達國民之志願，……推功讓能，自是公論。文承各省推舉，誓詞具在，區區此心，天日鑒之；若以文爲有誘致之意，則誤會矣。」

唐紹儀辭職後，袁伍之間經過幾次電報戰爭，裝點場面，而暗中仍不斷秘密交涉，最要者則爲清帝自行退位之交換條件，至民元正月初旬以後，彼此秘密交換條件，已有相當成熟。清帝在優待條件之下，自行退位，退位後，總理辭去臨時總統，而以袁繼任。十三日，載灃訪袁，叩以對於退位意見，袁以不得要領敷衍之。自退位消息傳出後，載灃、毓朗、良弼、鐵良等諸親貴，漸形憤激，對袁極端不滿。十六日，袁謁清太后後，途遇刺客，狙擲炸彈，不中，死傷衛隊數人，當場捕獲楊雨昌等三人，自認爲革命黨員，皆遇害。（退位

久未實現，革命黨中不知個中秘密者，以為袁作皇帝，該攝此激烈手段。因此清太后相信袁世凱不左祖革命黨，而真心謀清室之安全，對親貴攻讐袁，均不相猜忌。二十七日，北洋軍諸將校四十六人，亦皆贊成共和，由第一軍總統段祺瑞領銜，合電請清帝遜位，清帝無可如何，宗社黨軍意沮喪。二十九日，復開御前會議，突勸袁世凱均稱病未到，其他列席者，無一人敢發硬言。三十日，清太后召奕劻載灃二人入見，皆以官軍既無圖志，不若遜位全終，猶得優遇奉答。二月一日，乃用太后懿旨，命袁世凱與革命軍磋商退位條件。二月三日，袁入朝退出後，立即電復伍代表，謂「今始有權以護優待之舉。」雙方將優待條件商定後，於二月六日由南京臨時參議院修正，咨復臨時政府電達袁世凱，清帝遵儀遂於二月十二日（即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）下詔退位。其詞曰：

「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，前因民軍起事，各省響應，九夏沸騰，生靈塗炭，特命袁世凱遴選員與民軍討論大局，議開國會公決政體，兩月以來，尚無確當辦法，南北睽隔，彼此相持，商賢於途，士踞於野，以團體一日不決，故民生一日不安，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既倡義於前，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，人心所嚮，天命可知，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，拂萬民之好惡，是用外親大勢，內審輿情，特奉皇帝將統治權，公諸全國，定為共和立憲國體，近憶海內騷亂肇始之心，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。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，當茲新舊代謝之際，宜有南北統一之方，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，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，總期人民安堵，海內奠安，仍合商、漢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，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，優游濠月，長養國民之優禮，親見郵治告成，豈不懿歟！」

清自奴爾哈齊建國稱帝，凡二百九十七年，自多爾袞及順治入關，佔據中國，凡二百六十八年，至是而亡。當清帝遜位條件尚未商定，遜位詔書未下之時，一般志士，迫迫不及待者，袁世凱曾謂之曰：「三百萬大樹，欲根絕之未易易，不得其道，根折而樹復活，惟有法，曰：『親、良、提、正之既熟，一拔不能復活矣。』此時正當親、中，諸君毋躁！」捨畢，無不佩服世凱之真識者。○以王所紀史實，袁世參錄李劍農氏所著之「最近三

年中國政治史」。最後袁世凱謂「三百年大樹欲根絕之未易易」云云，則錄自黃炎培氏所著之「辛亥革命在上海」一文中。於此可窺袁出而組織內閣，所提出之六項條件，一二兩項，所謂明年即開國會，組織責任內閣，是完全欲將滿清親貴內閣廢除，皇族政權推翻，載灃之監國攝政王地位，歸於無用，而以漢人代替者。三四兩項，是不願與民軍戰爭，而欲與之謀妥協者。五、六兩項，則欲操縱軍事實權，以便自由運用，以冀達到推翻清室之目的者。至謂「三百年大樹，欲根絕之未易易，」一唯有一法，曰掘，掘之既熟，一拔不能復活矣，此時正在掘中，諸君毋躁！」云云，其深謀遠慮，更可想見一斑；洵非僅主張君主立憲者所能望其項背於萬一也。袁力主與革命軍議和，則與組織內閣時所提出之三、四兩項條件相契合，均為傾向革命之實證。觀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之決議：「如袁世凱反正，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」之議案，及總理就任臨時大總統後，尙一再表示，欲以總統之位置相讓之電文，可知袁在當時地位之重要，不惟滿清實權，在其掌握，即革命軍方面，亦重視其勢力，未可侮矣。又觀清帝之退位詔，益可想見自武昌起義以後，各省雖紛紛響應革命軍，而南北仍成相持之局，商輟於途，士露於野，民生不安，其所以不得不退位者，固由於南中各省倡義於前，而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，不能不謂為無重大關係。因人心之所嚮往，不欲拂萬民之好惡，故毅然授袁世凱以全權，與民國政府磋商遜位條件，得以早日南北統一，奠定中華民國也。嚮使袁世凱不明民族大義，仍効力滿清，與革命軍為敵，則清廷勢力，何時得以摧毀，殊難言矣。蔣廷黻氏於其所著之中國近代史大綱中，亦盛讚辛亥革命，打倒滿清之成績，謂係「掃除了一種民族復興的障礙」。其言曰：

「武昌起義以後，一月之內，湖南、陝西、江西、山西、雲南、安徽、江蘇、貴州、浙江、廣西、福建、廣東、山東十三省相繼宣佈獨立，並且沒有一個地方發生劇烈的戰爭，滿清的滅亡，不是革命軍以軍力打倒的，是清朝自己瓦解的。……」

滿清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，請袁世凱出來挽回大局，這種臨時抱佛脚的辦法，是不能生效的。袁世凱替清室謀得的，不過是退位以後的優待條件，為自己確得了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的地位。

辛亥革命，打倒了滿清，這是革命惟一的成功。滿清打倒了以後，我們掃除了一種民族復興的障礙。但是等到我們要建設新國家的時候，我們又與民族內在的各種障礙面對面了。……

民國初年，在我們這裏，軍權就是政權。辛亥的秋天，滿清請袁世凱出來主持大政，正因為當時全國最精的北洋軍隊，是忠於袁世凱的。中山先生在民國元年，所以把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，也與這個原因故有關。我們以前說過，在太平天國以前，我國並沒有私有約軍隊，有之從湘軍起，湘軍的組織和精神，傳給了淮軍，淮軍又傳給北洋軍，……」

夫所謂「十三省相繼宣佈獨立，並且沒有一個地方發生劇烈的戰爭」者，是殆民族主義深入於人心，故義旗一舉，海內響應也。所謂「滿清的滅亡，不是革命軍以軍力打倒的，是清朝自己瓦解」者，蓋指各省之相繼獨立及北洋軍領袖電迫清帝遜位而言，尤見其立論持平也。梁園東氏在其所著本國現代史中，載有：

「袁世凱所派的議和代表唐紹儀至漢口，徵露袁世凱有與革命軍聯合意，南方代表團，聞訊遽中止選舉總統，預備和議成後，舉袁為總統，因當時人士，以袁有絕大權力，自光緒末年以來，已多存信仰袁世凱心理。……」

是時袁世凱方積極與革命軍議和，十月十九日，已決定雙方實行停戰。……臨時政府既成立，對清廷和議，仍復進行，欲用和平方法，使清帝退位，此在當時，本有可能；惟挾雙方以自重的袁世凱，卻大不滿意。因袁意本欲與革命軍商定一種方法，使清帝退位後，一方由革命軍委託袁，他方由清室讓位於袁，由袁組織臨時政府。……

袁世凱藉口於唐紹儀無決定權，聲明其議定皆無效，唐因是辭職，和議遂歸停頓。和議既停頓，雙方已有再戰可能，袁且主使北洋系將領段祺瑞、馮國璋、段芝貴等四十餘人，聯名電奏清廷，主張君主立憲，反對共和，措詞甚為激烈，袁將此電轉達伍廷芳，頗有威嚇革命黨意。……

和議表面雖停頓，而暗中伍廷芳與袁世凱間，仍有電報往還，為實際的磋商，……且在北方的立憲派人

攝政等，亦隨時調停。其調停的總結，乃在：(1) 清帝退位，(2) 優待清室皇室，(3) 舉袁世凱為大總統。關於大總統一事，當孫文就任後，即曾電袁世凱表示，如果能使清帝退位，符全國希望，樹立共和政體，大總統一席，即當讓位以待。

民國元年一月十二日，清室以和議進行不利，開皇族會議，籌商辦法，時慶親王突動，已早由袁世凱給以議妥的優待條件，勸清室自動退位，突動於會議時，提出討論，各親王極不願，然未籌得別法，無結果而散。但退位的消息傳出後，清族中一班少年親貴，大為憤恨，知袁世凱與南軍通聲氣，不足恃。載濤、鐵良、良弼等，乃組織宗社黨，欲去袁自主。惟光緒帝后隆裕皇太后，頗以袁謀清室安全，不盡賣君，不聽。而宗社黨活動益烈，已預備奪袁柄，袁乃復命其北洋系將領段祺瑞等四十餘人，聯名發一通電，主張共和政體，謂將帶兵入京，與各親貴割陳利害。適是時革命黨人彭家珍，以宗社黨阻礙共和，將其首領良弼炸死，因此一事，清皇族皆懼，雖宗社黨人，亦不敢再發一語，於是清太后乃與慶親王奕劻及宣統父載灃，決定退位。二月一日命袁世凱與民軍磋商退位條件，袁乃電知伍廷芳，不數日優待清皇室及滿蒙、回、藏各條件決定，由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，電達袁世凱。

清室接受條件後，乃於二月十二日，下詔退位。清帝退位詔下後，袁世凱於次日即電知南京臨時政府，孫文接到此電後，亦即履行前約，同日即向參議院提出辭職書。至是清帝退位及統一問題，告一段落。

袁世凱以清室內閣總理大臣，其所以得為共和國元首，乃因其為普遍國內佔有勢力的北洋系的領袖，所謂北洋系，乃自光緒以來，漸漸造成的一種勢力集團。清室自太平天國事後，李鴻章等久已蓄意編練新軍，陸續已有成立，及甲午中日戰後，清廷益感於練兵必要，光緒二十一年，李鴻章等復保袁世凱添練新軍，清廷遂命袁世凱統率舊有定武軍十營，並增募若干，合為七千八，駐於天津南七十里小站地方督練，為新建陸軍，是即北洋軍的基礎。越三年，庚子拳亂作，與山東舊兵相合，擴充為二十營，益加操練。

其勢力始大。及光緒二十七年，李鴻章去世時，復保薦袁為直隸總督，清廷如其意授之，並兼北洋大臣。袁席李鴻章故業，遂將北洋系勢力繼承下來。次年，清廷復命袁世凱、鐵良等辦京旗練兵事宜，將北洋兵擴充為六鎮（後成二十鎮），其中將官多為小站練兵時將校，或天津武備學堂（曾國藩、李鴻章所創立）出身，如段祺瑞、王士珍、徐邦傑、姜桂題等，原為其學生；馮國璋、段芝貴、曹錕、王占元、張懷芝、陳光遠、田中玉等，皆其舊日部屬，至是省佔重要位置。清貴族如鐵良、良弼等極忌之，奪其兵，調入為軍機大臣，及宣統元年，更令其回籍養病，但袁雖去而其勢力仍存，故武昌起義後，清室命其出山維持，袁首請得節制各軍全權，遂能自由運用。忽而有四十餘將領通電主張君主立憲，忽而此四十餘將領又通電主張共和，欲與親貴割陳利害，無非袁之權力表現。其時各省雖多獨立，但各省軍隊多屬北洋系統，袁不傾向共和，革命必再生波折，而欲袁傾向共和，袁非據得最高政權不可，此為革命黨人不得不退出政府，事專向袁意辦理的原因。

可見袁在當時在國內佔有普遍之重大勢力，係席李鴻章故業，繼承其地位，與革命軍通聲氣，積極與之議和，為清廷親貴所嫉忌，則為顯然之事實。其時各省雖多獨立，但各省軍隊多屬北洋系統，袁不傾向共和，革命必再生波折，則又為必然之趨勢矣。即本黨鄒魯先生所著之中國國民黨史稿中，亦謂：

「初，袁世凱以力主改革，與載灃不睦；鐵良、良弼等，亦惡其勢日張，謀去之，因茲藉信任，不得間，及慈瀟、德宗相繼歿，載灃當國，即黜袁世凱，以步履維艱，難資輔弼為辭，勒令回籍。及武昌事起，清廷乃以袁世凱為湖廣總督，所有湖北軍隊及各路援軍，均歸袁世凱節制調遣。袁以足疾未痊力辭，徐世昌時為內閣協理大臣，微服出京說之，袁心動，遂應召，視師江漢。繼照資政院議決信條（總理大臣由國會公選，皇帝任命之，其他國務大臣，由總理大臣推舉，皇帝任命之，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，并各省行政長官。）入京組織內閣，袁為總理大臣，一切用人行政，悉由總理大臣負責。臨時政府成立，總理致袁書，勸其歸順，書如左：

「北京袁總理鑒，文前日抵滬，諸同志皆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任相屬，問其理由，蓋以東南諸省，久缺統一之機關，行動非常困難，故以組織臨時政府，為生存之必要條件。文既審艱虞，義不容辭，祇得暫時擔任。公方以旋乾轉坤自任，即知億兆屬望，而目前之地位，尙不能引嫌自遜。故文雖暫時承之，而虛位以待之心，終可大白於將來，望早定大計，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！」

先是袁世凱受任以後，即派蔡廷幹劉承恩來滬，與黎元洪議和，時因袁暗殺吳祿貞，民軍激昂，不得要領而去。及清軍陷漢陽後，袁又託英公使朱爾典訓令漢口領事勸兩方停戰，嗣民軍與清軍兩方相約，初停三日，續停十五日，均按兵不動，各守所佔領土地。袁世凱所派之議和代表為唐紹儀，黎都督所派之議和代表為伍廷芳，初擬以漢口為議和地點，繼因伍在上海，正辦外交，唐乃由漢口至上海，而以上海為議和地點。……初爭民主君主問題，適總理回國，清廷……乃以此問題付之國民會議，至國民會議選舉辦法，……唐實未得清內閣覆電協定，袁怒，而唐辭職，袁乃謂以後議和事件，直接與伍電商，並不承認國民會議之協定，尤詰責南京組織臨時政府，和議幾於決裂。臨時政府決定用兵方略，……袁乃大權，……又以總理有勸歸順之書，乃密使唐紹儀與臨時政府交涉，復行製造議和空氣，總理當時本主張徹底解決，乃因（一）款項扼於參議院，（二）各軍有為和議動者，（三）中堅黨員有主張和議至堅者，總理不得已於一月二十二日提最後協定五條：

（一）清帝退位，由袁同時知照駐京各國公使，請轉知民國政府，現在清帝已經退位，或轉飭旅滬領事轉達亦可。（二）同時袁須宣佈政見，絕對贊同共和主義。（三）文達到外交團，或領事團通知清帝退位佈告後，即行辭職。（四）由參議院舉袁為臨時總統。（五）袁教舉為臨時總統後，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，乃能授受事權。

總理之辭職提出，袁之態度已變，袁即授意段祺瑞，聯合軍官四十餘名，要清帝退位。時清軍糧資戰爭優待最重條件，及段等電至，氣為之攝。及一月二十六日為梗最力之良詞，為彭家珍炸而死，清廷大震，遂

於二月十二日宣布退位（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）。

清帝退位，袁世凱即電臨時政府表示贊成共和。至是臨時大總統於二月二十三咨參議院辭職，並荐實自代。咨曰：「……本總統以為我國民之志，在建设共和，傾覆專制，義師大起，全國景從，清帝鑒於大勢，知保全君位必然無效，遂有退位之議。今既宣布退位，贊成共和，承認中華民國，從此帝制永不留存於中國之內，民國目的，亦已達到。當締造民國之始，本總統被選為公僕，宣言誓書，實以傾覆專制，鞏固民國，圖謀民生幸福為任，誓至專制政府既倒，國內無殘亂，民國卓立於世界，為列邦公認，本總統即行解職。現在清帝退位，專制已除，南北一心，更無變亂，民國為各國承認，且夕可期，本總統當踐誓言，辭職引退，為此咨貴院，應代表國民之公意，速舉賢能，來南京接事，以便解職」云云。

又謂「本總統本日提出辭表，要求被選賢能，係國民公權，本總統實無容喙之地，惟前使伍代表電北京，有約以清帝退位，袁世凱宣佈政見，贊成共和，即當提議推讓，想貴院亦表同情。此次清帝遜位，南北統一，袁君之力實多，其發表政見，更為絕對贊成共和，舉為總統，必能盡忠民國；且袁君富於經驗，民國統一，賴有建設之才，故敢以私見，貢荐於貴院，請為民國前途熟計，無失當選之人，大局幸甚！」

四月初一日，臨時大總統孫文，蒞參議院行解職禮，其詞曰：「本大總統於中華民國正月初一日，來南京受職，今日四月初一日，至貴院宣佈解職，自正月初一日至四月初一日，為期逾三個月，在此三月中，均為中華民國草創之時代，當中華民國成立以前，純然為革命時代，中國何為發起革命，實行聯合四萬萬人推倒惡劣政府為宗旨，自革命初起，南北界限，尚未化除，不得已而有用兵之事，三月以來，南北統一，戰事告終，造成完全無缺之中華民國，此皆全國國民及全國軍人之力所致，在本總統受職之初，不料有如此之好結果，亦不料以極短之時期，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業。……」

陸曼炎氏在其所編之辛亥開國革命史略中，亦謂：

「臨時政府方面，一面秣馬厲兵，準備北伐與清廷武力解決；一面認清大局轉移的關鍵，繫於袁世凱一

人。假使對袁氏沒有適當的安置，全國統一，不易實現。中山先生雖有澈底澄清的意思，而一部分黨員與軍隊，又期望和議甚切。且臨時政府草創之時，實力也不充分，盱衡局勢，不得不捨重就輕，委曲求全。

南京臨時政府孫大總統，原有諸言在先，祇要清帝退位，袁世凱宣布贊成共和，便當虛位以待。迨清帝正式下台，袁氏即通電臨時政府，表示政見，擁護共和。孫大總統接得清帝退位及袁世凱贊成共和的電文後，就於二月十三日，向參議院提出辭文，推荐袁世凱自代，以踐前約。……

又據梁任公先生言：「袁世凱於戊戌之際，即已潛伏取清廷而代帝之心，其欲強中國，革腐政之心，實不在人後。惟自始至終，一『私』字橫亘於胸。茲將吳昌氏所著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中，關於縷述世凱者，摘錄如下：

「據先師（指任公）所親述：『袁氏變法維新之見解，實出於自動。擁德宗以武力行政之計劃，實亦發動於袁氏，而決非壯飛（譚嗣同）所強迫。事後細思，乃知戊戌之際，袁氏即已潛伏取清廷而代帝之心矣。其用心深長細遠，吾輩純白書生，盡爲所欺，至十餘年之久，真一世之奸雄也。袁氏初從吳忠壯公（長慶）於朝鮮，豪爽奔放，以一時人傑自命。時與馬相伯（良）、眉叔（建忠）、張季直（謇）……等新進名流，上下其議論，故欲強中國，革腐政之心，袁氏實不在人後。又眼見朝鮮爲日人從其手中奪去，經此刺激，其愛國之心，實亦強烈而真摯，並不由於壯飛一席之語所啓發。惟自始至終，一『私』字橫亘於胸，必須將中國移爲其袁氏之私產以後，乃竭力整頓使成爲富強，此所以身敗名裂，貽禍中國無窮也。南海先生未變政時，袁氏深恐中國即刻亡，乃協謀變政；及變政略有端緒，又恐中國之強，由翁、康、梁、譚，而已則爲禍，故賣主而告密。及變政既已失敗，又恐大權在裕祿，而已則仍爲禍，乃復推行新政於直魯，培實力而博民心，俟良機以倒清廷。事後推尋其線索，其稱帝之念，固已潛蓄於戊戌以前，一貫而未嘗變也。』

吾人綜上以觀：可知袁世凱亦欲強中國，改革清政者。當戊戌之際，即已潛伏取清廷而有代帝之心矣。因

此遂與載灃不偃，鐵良良弼等，亦惡其勢日張謀去之者。惟世凱始終有一「私」字，橫亘於胸，以視總理之天下爲公，敵履尊榮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耳。厥後段祺瑞聯合軍官四十餘名，要清帝退位，實由袁世凱之授意。「清帝遜位，南北統一，不勞戰爭，善圖民之志願。」即總理亦謂「袁君之力特多」。故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，推功讓能，力荐袁世凱以自代也。總理之辭臨時大總統，固由其高尚純潔，成功不居，有揖讓之風。然使世凱果無功於民國，則總理何必作此言，更何必荐其以繼任總統哉？若謂袁世凱領導北洋軍與革命軍合力推翻滿清，意在覬覦總統位置，信如斯言，則又何解於世人責會國藩不取清而代之？昔王船山嘗言：「即使桓溫輩，功成而篡，猶賢於戴異族以爲中國主。」故自民族立場言之，是世凱之所爲，實爲船山之所許矣。章太炎劉申叔諸氏，曩嘗致書袁世凱，勸其效曹孟德司馬仲達之故事。略謂「胡虜無百年之運，劍運過一百年？桓公復九世之仇，況仇深於九世？」因嫉惡滿清，故亟思利用袁世凱之權勢，取清而代之。是世凱之所爲，亦爲革命黨人之所贊同矣。

民國成立後，袁世凱恃北洋軍之武力，違法妄爲，固爲言人所痛惡，而在清末民初鼎革之交，世凱領導北洋軍與革命軍，戮力同心，合作推翻清室，其功則未可抹煞也。嘗分別論之，不可併爲一譚。詩云：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君子對於袁世凱就任總統後，不踐諾言，縱護民國，則又不能不深致惋惜耳！

辛亥武昌起義，湘人蔡鍔適在雲南軍中任協統，遂率軍響應，被推爲都督。民國成立後，滿清帝制雖被推翻，而一般軍人，驕橫跋扈，濫用權威，鐔目擊心傷，因將會胡治兵語錄，纂集成書，以爲教將之方；並繫以評語，詞多沈痛。其言曰：

「今日吾國社會風氣敗壞極矣，因而感染至於軍隊。以故人才消乏，不能舉兵之實績，頹波浩浩，不知所屆。惟在多數同心共德之君子，相與握掣維繫，激盪挑撥，障狂瀾於既倒，俾善者日趨於善，不善者亦潛移默化，則人皆可用矣。」

「今日時局之危殆，禍機之劇烈，殆十倍於咸同之世。吾儕自膺軍職，非大發志願，以救國爲目的，以

死爲歸屬，不足渡同胞於苦海，置國家於坦途。……若吾輩軍人將校，則躋高位，享厚祿，安福尊榮爲志；日兵則以希虛譽，得餽清爲志，會胡兩公必痛哭於九原矣。」

此言民元後，軍紀敗壞，時局危殆，會胡在九原，亦必爲之不滿也。其後袁世凱恃北洋軍之武力，受袁克定楊度等之賤蔽，背叛民國，帝制自爲。蔡鍔在雲南就中華民國護國第一軍總司令之職，敢於偏隅，首揭義師以聲討世凱，各省紛起響應，終以恢復民國，打倒不肯繼承者，殆深受鄉先賢會胡兩公精神之感召也！

自興中會以還，揭義旗以反清，若廣州之役、惠州之役、潮州之役、黃花崗之役，以及武昌起義，殆無不有湘人參加。而立功民國，名垂黨史，如黃興、蔡鍔、宋教仁、譚延闓等，又皆籍隸三湘。其欲以事功表見於國家民族者，頌頌相望，如蓬從風，尤難以更僕數，而謂其未嘗受鄉先賢會文正之遺澤影響，誰其信之？

六 撤退之湘軍大部加入哥老會從事革命運動

明社既屋，滿清入主中原，遺民諸老，以大勢既去，事無可爲，而仍以恢復故物爲職志，藉文字以抒民族思想，若顧亭林、黃梨洲、王船山、孫夏峰、閻古古之流，其最著者。康熙間，文字獄迭興，殺戮無辜，明室遺民，復國運動，因以中蹶，流風所及，結合同志，潛蹤密談，而廣續其排滿運動者，則爲秘密之結社，如三合會哥老會是也。道光時，洪秀全納三合會之一部，成太平軍。太平軍以推翻清室，倡行耶教爲宗旨，倘僅以推翻清室爲鵠的，而不倡行耶教，則湘軍無詞可藉，而太平軍之成敗，殊難言矣。

湘軍撤退後，散佈於民間，而大部則投入哥老會，從事反清工作。哥老會自湘勇加入後，黨徒衆多，其勢益盛，蔓延於長江流域，而以湖南等省爲根據地。有青紅幫之分，兩幫各有大小首領，互相協助，有共患難同生死之概，故總理進行革命時，會聯絡其會黨首領畢永年、李雲彪等。厥後哥老會推代表七人，與興中會領袖二人，三合會頭目二人，在香港開代表會議，結果議決併入興中會，而爲後日同盟會之濫觴。總理在其所著之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三講中，會謂：

「洪秀全失敗以後，民族主義更流傳到軍隊，流傳到游民，那時的軍隊如湘軍、淮軍，多屬會黨。即如今日青幫、紅幫等名目，也是由軍隊流傳而來。……那時會黨散在珠江流域的，叫做三合會；散在長江的，叫做哥老會，哥老會的頭目，叫做大龍頭。」

又總理在其所撰之自傳云：

「士大夫醉心利祿，惟所稱下流社會，反有三合會之組織，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，雖時代運遠，幾於數典忘祖，然苟與之言，猶較縉紳爲易入，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。……迄於庚子，長江會黨（即哥老會）及兩廣福建會黨（即三合會）始併入於興中會，會員稍稍衆。」

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著之革命先烈傳記黃興傳中，亦謂：

「前此希望清廷維新變法者，至是亦多萌革命思想。與於此時回國，發動民族革命，其步驟分爲三點：一、組織華興會，留日歸國者及國內知識份子，多紛紛加入。二、組織同仇會，各秘密會社多隸屬焉。三、創辦明德學堂於湘潭，結納同志，培植革命青年。……華興會成立後，會衆多屬知識份子，與恐與洪會接洽，或多隔閡，乃別創同仇會，以聯洪會等下層組織，並仿日本將佐尉各級軍制，編組爲革命軍旅。與自任大將，兼會長職權，劉揆一任中將，掌理陸軍事務；馬福益任少將，掌理會黨事務。湖南瀏陽普集市，向例於每月某某等日，開牛馬交易大會，蒞會者凡數萬人，爲湖南有名之集會。與會羣衆，大半屬哥老會籍，故哥老會亦規定是日爲拜盟宣誓之佳節，同仇會卽於是日舉行馬福益之少將授與式，由劉揆一代表會長暨誓，並給長鎗二十挺，手鎗四十枝，馬四十四匹，儀式莊嚴，觀者如堵，自是哥老會員相繼入會者，不下十萬人。」

清稗類鈔中，亦載有：

「哥老會一稱哥弟會，秘密會黨也。或謂其成立乾隆時，同治朝，以粵寇平而撤湘軍，其人窮於衣食，多入此會。哥老會之宗旨，與三合會無異，亦以復明爲言。」（按三合會之宗旨爲復明逐滿。）

中國秘密社會史中，又載有：

「自同治間，平定洪楊以後，湘勇撤營，窮於衣食之途，從而組織各團體，於是哥老會始盛。」

而該書又引章太炎先生之言曰：

「白蓮教者，自蓮社造端，是以有香軍之目，值胡元猜夏，人心思宋，故其教兼爲種族。……訖明之亡，子遺黃髮，謀所以光復者，是以鄭成功在臺灣、閩海之濱，聲氣相應，熊開元汝應元，皆以明室遺臣，祝髮入道，故天地會自福建來。其後乃有哥老三合，專務攘除胡貉，而與宗教分離，扶義憫僮，不依物怪，視白蓮諸教爲近正。」

又據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時，曾聯絡此等會黨云。

「哥老會，清代秘密會黨之一，相傳成立於清乾隆時。同治時，湘軍攜營，大部歸入哥老會，黨徒衆多，蔓延於長江流域，而以湖南等省爲根據地，有青幫紅幫之分，兩派各有大小首領，招收黨徒。滿清以舉族入軍中原，此等秘密會黨，最初組成時，大部含有民族思想，而黨徒間，互相協助，有共患難同生死之概，故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時，曾聯絡此等會黨云。」

而本黨者宿居湘中父老，亦有對愚作如是言者。可見哥老會爲復明透滿之秘密會黨，撤退之湘軍，大部加入哥老會，編理進行革命時，曾聯絡此等會黨也。又據馮自由氏所著之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所載，亦云：

「革命黨與哥老會與中會員與哥老會關係最深者，爲湖南人畢永年。庚子漢口之役，哥老會諸頭目，多爲唐才常林走所用，畢介紹之力也。畢於己亥年嘗偕日人平山周漫游漢口、長沙、瀏陽、衡州各地，結識哥老會頭目李雲彪、楊鴻鈞、張堯卿、李堃山、辜天佑、師襄諸人，發揮與中會之宗旨，及孫中山之生平，欲使哥老會與與中會聯合倒滿，李楊等頗爲所動。是年冬，畢偕哥老會頭目七人抵香港，實行與中、三合、哥老三會合併事，仍稱與中會，公推孫中山爲總會長，與議者有陳少白、楊衢雲、史堅、畢永年、宮崎、李雲彪、楊鴻鈞、辜鴻恩、張堯卿、李堃山、鄭士良等十餘人。議定綱領三則，歃血爲盟，鑄印章上諸中山。……此哥老會參加近年中國革命歷史之大略也。及甲辰年，黃興劉揆一在湘運動革命，以哥老會龍頭馬福益之力爲多。」

而鄒魯氏於其所著之中國國民黨史稿中，亦謂：

「甲辰長沙之役，紀元前八年十月，黃興與馬福益謀舉義長沙，事洩，馬福益死焉。黃興本名軫，號克強，兩湖書院學生，以中國積弱，滿清無道，主張非倒滿無以救中國，唐才常漢口之役，黃興與焉。嗣以留學日本，入弘文學院師範班，紀元前九年歸國，與胡子靖創辦明德學堂，以爲機關，並傳播革命思想，

以張繼等任教員，並成立華興會，以黃興爲會長，密圖湘，聯絡哥老會首領馬福益，宋教仁、陳天華、劉揆一等均與焉。至紀元前八年，運動成熟，擬於九月乘西太后慶壽之期，施放炸彈，一網炸盡，各路並起，佔有長沙，以爲根據。乃事前有黨員二人，在湘潭縣被捕謀洩，湘撫發兵圍學堂，學生被捕者十餘人，黃興、宋教仁、劉揆一、張繼等先後得報，易服分逃至湖北，先後折至上海，馬福益事後由桂返湘，欲圖再舉，被捕死之。

此皆哥老會參加革命運動之見諸載籍可考者，其他不便備載。由此可知湘人黃興、唐才常、胡子靖等，早已參加革命運動，而宋教仁、陳天華、劉揆一等，均爲哥老會之會員矣。會黨散佈於珠江流域者，謂之三合會，散佈於長江流域者，謂之哥老會。近代革命運動，以粵湘兩省人才爲最盛，一由於總理及洪楊之影響，此世人所共知也；一由於三合會、哥老會及船山學說之影響，此世人所罕知也。而哥老會與湘軍有關，船山學說因曾氏重刻其遺書而大顯，則爲世人所不知也。茲特表而出之，以見曾氏撤退之湘軍，亦與革命運動有關。是否出於曾氏指示，雖不可考；而撤退之湘軍，大部加入哥老會，哥老會曾參加革命運動，則有史實可以覆按也！

七 重刻船山遺書欲廣佈民族思想於社會

王夫之，字而農，號薑齋，明湖南衡陽人。清兵入湖南，夫之會起兵抗之，戰敗，走驪虞，爲桂王行人，桂王敗，夫之遂隱遁不出。晚年居湘西之石船山，學者稱爲船山先生。其學主經世致用，其政治思想，則在嚴夷夏之大防，嘗謂「天下之大防，夷夏之大辨，五帝三王之大統，即使桓溫輩功成而篡，猶賢於戴異族以爲中國主。」又謂「保其類者爲之長，衛其羣者爲之邱。……可禪可繼可革，而不可使異類間之。」其論隋楊堅之篡北周宇文覺曰：「宇文氏鮮卑之運已窮，天乃默移之，而授之楊氏，以進李氏，而復中國。故楊氏之篡，君子不得謂之賊，於宇文氏則逆，於中國則順。」臨卒之前，自題其墓曰：「明遺臣王某之墓。」其深於民族思想類如此。其遺書直至道光十五年，裔孫世全始爲刊刻百五十卷，旋因咸豐四年太平軍攻湘潭，板毀於火，以致其學不顯，名仍寂然無聞。曾氏憬然有感於中，爰於同治初元，與乃弟國荃謀重刻焉，而增益百七十二卷，庀局於安慶，嚴事於金陵，時閱三四載。此後船山學術思想，遂大顯於世，而與顧亭林黃黎洲相鼎峙；尤以讀通鑑論三十卷，宋論十五卷，充滿擬夷思想，膾炙人口，吾讀其書，猶想見其忠貞卓絕，大義凜然。夫船山嘗明清鼎革之交，慨異族之入主中夏，著書立說，潛傳民族思想，故國之感，生死不忘，爲嫉惡滿清最力之一人，其書湮沒不彰，已二百餘年於茲矣！曾氏獨與其弟國荃合謀重刻，爲人之所不敢。並著序表揚，至稱之爲「博文約禮，命世獨立之君子，」而無所顧忌，使其廣爲流傳，能不欽佩其勇氣乎？謂非深具民族思想者，顧能如是耶？章太炎先生於其所著之章氏叢書檢論中嘗論之，謂：

「曾國藩者，譽之則爲望相，讖之則爲元凶，要其天資，亟功名，善變人也。……既振旅，始爲王而農行遺書，可謂知悔過矣！其功實方諸唐世王鐸、鄭畋之倫。」

又在其復湖南船山學社書中，謂：

「船山學術，爲漢族光復之原，近代倡義諸公，皆聞風而起者，水原本本，端在於斯。曾滌篁……在金陵，將船山遺著發刊，人謂曾氏悔過之舉，此與錢謙益嬰鼎辜輩，晚年事蹟正同。」

梁任公先生於其所著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，對此事亦有所論及云：

「中庸說：『君子之道，闢然而日章。』南明有兩位大師，在當時，在本地，一點聲光也沒有，然而在幾百年後，或在外國，發生絕大影響；其人曰王船山，曰朱舜水。船山生在比較偏僻的湖南，當時名士，除劉繼莊獻廷外，沒有一個相識，又不開門講學，所以連門生也沒有。張獻忠蹂躪湖南時候，他因爲不肯從賊，幾乎把命送掉。清師下湖南，他在衡山舉義反抗，失敗後，走桂林，大學士瞿文忠式相很敬重他，特薦於永歷帝，授行人司行人。……其後式相殉節桂林，起恆也在南甯遇害，船山知事不可爲，遂不復出。當時清廷嚴令難髮，不從者死，他誓死抵抗，轉徙苗蓀山洞中，艱苦備嘗，到處拾些破紙或爛帳簿之類，充著作稿紙，著書極多，二百年來幾乎沒有人知道，直至道光咸豐間，鄧湘皋顯鶴鶴集起來，編成一張書目，同治間曾沅圃國荃纔刻成船山遺書，共七十七種，二百五十卷，此外未刻及已佚的還不少。……」

自將船山遺書刻成之後，一般社會所最歡迎的，是他的讀通鑑論和宋論。這兩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，但在史評一類書裏頭，可以說是最有價值的。他的一貫精神，借史事來發表；他有他的特別眼光，立論往往迥異流俗，所以這兩部書，可以說是具有主義有組織的書。若拿出來和呂東萊的東萊博議，張天如的歷代史論等量齊觀，那便錯了。「攘夷排滿」，是裏頭主義之一種，所以給晚清青年的刺激極大。」

又在公先生其所著飲冰室文集，對船山遺書印出後，影響於種族革命，又有述及云：

「此種書在科舉廢後，人都視爲平常，其實先生具有特別眼光，翻案文學很多，最有應影的，是排滿論調。所以同治年間，印出此書，便造成光宣之際一般的種族革命論，這是不可磨滅的。」

由此以觀：則知船山學術，爲漢族光復之原，近代倡義諸公，聞風而起者，推究本原，胥受其影響。船山在當時雖無聲光炫耀，而在二百年後，則發生絕大影響，所謂「君子之道，闢然而日章」是也。莊生有言：「其

作始也簡，其將畢也鉅。」殆此之謂歟？夫韋梁兩先生，爲當代學術界泰斗，世所宗仰者也！則其所言，自係有所見而云然，可以取信於天下，當無疑義。使曾氏果無民族思想，則對於有觸忌諱之船山遺書，必致乾隆時修四庫全書之諸吏，方呈請查禁銷燬之不暇，以邀褒獎，又何必爲之表彰而重刻哉？儻不爲之表彰重刻，則晚清思想界，民族革命運動，未必能如此發揚，乃必然之勢，不難於韋梁兩先生文中窺見其涯埃矣。故愚謂其重刻船山遺書，乃欲廣佈民族思想於社會者也。曾氏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，諭紀澤紀鴻兩兒云：

「行軍本非余所長，兵貴奇而余太平，兵貴詐而余太直，豈能辦此滔天之賊？即前次屢有克捷，已爲僥倖，出於非望矣。爾等長大之後，切不可涉歷兵間，此事難於見功，易於造孽，尤易於貽萬世口實。余久處行間，日日如坐鍼氈，所差不負吾心，不負所學者，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。」

於此更可窺其涉歷兵間，非其素願，如坐鍼氈，衷心極感不安。其所以如此者，則爲愛民，即前審所謂抱民胞物與，悲天憫人之懷也。所謂「易於造孽」，殆感於平洪楊，雖出於迫不得已，而鏖戰多年，同族相殘，死傷不可勝數，極人生之至慘，必貽無窮之孽也。所謂「易於貽萬世口實」，殆亦有見於當時及後世不諒其苦心，故於聖歲同治初元，即重刻船山遺書，以彌其缺憾耳。

太炎先生於曾氏之平洪楊，雖有微詞，然於其重刻船山遺書，則一再認爲悔過之舉。吾聞聖賢之勉人曰：「過則勿憚改。」又曰「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」又曰「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食。」曾氏亦自謂「凡人不可不慮有過，但患文過，不貴無過，但貴改過。」信如太炎先生所言，則曾氏此舉，亦不失爲改過之舉，不尤值得稱頌者乎？

凡人之中心思想，可於其言論及其行爲窺之。愚以爲曾氏之重刻船山遺書，正足反映其中心思想之所在，乃世人竟加忽視，所宜反覆審察者也！黎庶昌氏於其所編之曾文正年譜中，曾謂：

「公之爲學，其大綱宗，略見於所作王船山遺書序，而備見於聖哲畫像記。」

又謂：

「我公所以樹聲建績，光輔中興者，或籌議稍迂，而成功甚奇；或發端至難，而取效甚遠；或任人立事，爲衆聽所駭怪，而徐服其精；或爲國忘軀，受萬口之詆訾，而所全實大。……惟後世讀公書者，諒亦有取於此云。」

吾聞知師莫若弟，庶昌爲曾氏高足，則其所言，可以深長思矣。曾氏重刻船山遺書，固可見其微意之表露；而船山學術，影響於晚清思想界，則亦「籌議稍迂，而成功甚奇，發端至難，而取效甚遠」之顯著例證也。梁任公先生於曾文正嘉言鈔序中，亦謂：

「曾文正者，豈惟近代，蓋有史以來，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！豈惟我國？抑全世界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！……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三並不朽，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，其一生得力，在立志自拔於流俗，而困而知，而勉而行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抑，不求近效，銖積寸累。受之以虛，將之以勤，植之以剛，貞之以恆，帥之以誠，勇猛精進，堅苦卓絕，如斯而已！如斯而已！」

龍夢蓀氏作曾文正公學案，亦於其序中，謂曾氏：

「困知勉行，力追前哲，特立獨行，自拔流俗，雖極人世艱苦之境，而曾不少易其心；雖遇千挫百折之阻，亦不足以奪其志。」

是皆描寫曾氏之意志者。愚默察曾氏重刻船山遺書，則亦特立獨行，自拔於流俗，不求近效，銖積寸累之舉也。夫意志爲行動之前驅，又爲事實之母，使曾氏無意於闡揚民族思想，則又何必重刻船山遺書，天下固無如此巧值之事也！一國之政治與社會演變，又皆各有其一定之因果律，所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船山遺書既流傳社會，深入民間，故其攘夷排滿思想，亦充滿於國中。飲水思源，曾氏之功，又烏可沒哉！

八 外交政策注重自立自強以樹威信

曾氏自派李鴻章接滬後，以鴻章常與外人發生交涉，因於致辭函中，時時其對於外交之見解。故曾氏安內之豐功偉績，固昭耀寰宇，即其接外之碩畫佳謀，亦有可得而言者。曾氏受儒家之影響最深，對外交涉，亦以孔子所謂「言忠信行篤敬」為主，如復李鴻章書云：

「夷務本難措置，然根本不外孔子『忠信篤敬』四字。篤者厚也，敬者慎也，信則不說假話耳，然却極難。吾輩從此一守下手，今日說定之話，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。」

又云：

「與洋人交涉，其要有四語：曰言忠信，曰行篤敬，曰會防不會勦，曰先疏後親。忠者無欺詐之心，信者無欺詐之言，篤者質厚，敬者謙謹，此二語著，無論彼之或順或逆，我當常常守此而勿失。」

對外交涉，薄物細故，曾氏主張不必計較，遇薄之重大者，則憤死力與之苦爭，冀復吳附匪轄云：

「鄙意辦理洋務，小事不妨放鬆，大事之必不可縱者，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。」

並主張修明政治，力圖自強，則外人自可不致無端欺凌，以謙遜自處，外人自可不致藉端啓釁。如復李鴻章書云：

「夷兵藉我兵，敬讓加體，何伯待閣下，詞意和順，此最好機括。但宜戒我軍莽勇，謙卑聽順，匪驕匪傲。語言之間，莫吝譏諷，報義之間，莫占便宜。以正理言之，御孔子忠信以行禮節之道，以陰機言之，御拘踐卑辱以駭吳人之法。聞前此滬上兵勇，多為洋人侮慢，自閣下帶湘淮各勇到防，從無受侮之事。孔子曰：『能治其國家，難敵侮之。』我苟整齊嚴肅，百喪黎明，渠亦自不敢無端欺凌；既不蒙其欺凌，則處謙遜，自無後患，柔遠之道在是，自強之道亦在是。」

又主張與外人交際，形迹宜疏淡，手段宜渾合，而以自立為主，如復學編書云：

「與洋人交際，孔子忠敬以行禮節，句踐卑遜以騎吳人二義，均不可少。形迹總以疏淡為妙，我就彼而足以自立，則彼必愈求親睦，此一定之情態也。」

又云：

「與洋人交際，手段不宜過峻，宜帶渾合氣象，漢之欺侮詭譎，蔑視一切，吾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，恍似有幾分癡象者，亦善處之道也。」

外交之道，雖有賴於外交家之折衝樽俎，要以國力為後盾。曾氏以為對待外國，除注重恩信外，全在自立自強，以樹威信，尤為根本之論。如復應敬齋書云：

「自古善取外國，或稱恩信，或稱威信，總不出一信字，非必顯露條約，輕棄前諾，而後為失信也。即纖悉之事，嘲笑之間，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，心中待他只有七分，不必假裝十分，既已通好講和，凡事公本照拂，不使遠人吃虧，此恩信也。至於令人敬畏，全在自立自強，不在裝模做樣，臨難有不可屈撓之節，臨財有不可動搖之廉，此威信也。周易正家之道，桐以有孚之威歸諸反身，況立威於外域，求學於異族，而不可不反求諸己哉！」

又以自強之道，繼以修政事，求賢才為急務，以舉炸炸廠、學造輪舟等具，為下手工夫，如其日記中所云：

「欲領夷人，不宜在關稅之多寡，禮節之恭倨上着眼。即內地民人、居處、媚夷、黷夷、而鄙夷、借夷而壓辱、雖極可恨可惡，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着眼。吾輩着眼之地，前乎此者，洋人十年八月入京，不傷毀我宗廟社稷，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，助我攻剿髮匪，二者皆有德於我，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。欲求自強之道，總以修政事，求賢才為急務，以學作炸廠、學造輪舟等具，為下手工夫。但使彼之所長，我皆有之，順則報德有其具，逆則報怨亦有其具。若在我者挾持無具，則曲國罪也，直亦罪也，怨之罪也，德

之亦罪也。內地之民，人人媚夷，吾固無能制之，人人仇夷，我亦不能用也。」

曾氏又以爲欲求勝外洋，在於官能濟廉，兵有紀律。如復李鴻章書云：

「鄙意求勝於洋，在中國官不要錢，兵不見戲，不僅在稅餉之盈絀，尤不在體制之崇卑。」至於對外交涉，不可多樹敵，陷國際地位於孤立，曾氏亦嘗言之，如復曾佩蘅函云：

「竊謂中國與外國交接，可偶結一國之小怨，而斷不可激各國之衆怒。」

惟其注重自立自強，不願激動衆怒，故辦理天津教案，鑒於中國當時國力未充，未便遽啓兵端，始出於委曲求全之一途也。此案發生後，清廷曾命曾氏赴天津查辦，並諭以查有實據，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，將匪犯按律懲辦，以除地方之害。曾氏奏曰：

「各省打毀教堂之案，層見迭出，而毆斃領事洋官，則從來未有之事，即使曲在洋人，而外國既斃多命，不肯更認理虧，臣但立意不欲與之開釁，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，庶在我不失柔遠之方。」

六月抵津，查詢仁慈堂挖眼剖心，毫無實據。奏曰：

「探生酌藥，野番兇惡之族，尙不肯爲，英法乃著名大邦，豈忍爲此殘忍之行，以理決之，必無是事，況彼以仁慈爲名，而反受殘酷之謗，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。」

又奏曰：

「誅爲首滋事之人，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縣，革職治罪。」

清廷復諭以洋人詭譎性成，得步進步，若事事遂其所欲，將來何所底止，是欲弭釁而不免啓釁也。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嚇之語，曾國藩當力持正論，據理駁斥，庶可折敵饒而張國維。曾氏復奏曰：

「中國目前之力，未便遽啓兵端，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，……時事雖極艱難，謀畫必須斷決。伏見道光庚子以後，辦理洋務，失在朝戰夕和，無一定之至計，遂至外患漸深，不可收拾。皇上登極以來，守定和議，絕無更改，用能中外相安，十年無事，津郡此案，因愚民一旦憤激，致成大變，初非臣僚有意挑釁，朝

廷昭示大信，不開兵端，此實天下生民之福，以後仍當堅持一心，曲全鄰好，以爲保民之道，時時設備，以爲立國之本，二者不可偏廢。」

又其覆寶佩衛函云：

「中國海上船政，全無預備，陸兵則綠營固不足恃，勇丁亦鮮勁旅，若激動衆怒，使彼協以謀我，處處宣防，年年議戰，實屬毫無把握。」

是皆可見曾氏對外之苦心，其所以不欲遽啓兵端者，實出於不得已也。關於天津教案事，吳汝綸氏於曾氏神道碑中，亦嘗述及。如謂：

「公移直隸總督，天津民有擊殺法蘭西領事官者，法人訟之朝，天子慰解之。法人固爭，有詔備兵以待，公曰：『百姓小忿，不足釀邊釁。』從之，而密議儲將練兵，設方略甚備，先是公已積勞成疾，至是疾益劇，會江南闕帥，上念南洋戡夷，事任絕重，非公不可，遂命還江南臥治之，至則經營遠略益勤。」

張裕鈞氏於曾氏安內攘外之鴻猷，亦嘗爲文稱頌之。如云：

「往者咸豐之初，海內倏擾，太傅文正公，蘊偉抱，起湖湘，傾誠殫智，迴轉一代之全局，忠憤激發，倡勳宇宙，豪傑景從，卒手夷大難，更新乾坤，河岳不傾，盛德殊烈，垂於永世。而是時海疆事變，亦乘間并作，上下憂危，羣議炫惑，文正公以爲不量彼己，而輕挑疆敵，是以其國注也。不修備而始久無事，是自削也。是以戰銳養威，外登務爲懷柔，而內自憤發，以徐圖自強之術。日夜與在事數鉅公，通變吏俗，興起諸務。」

曾氏之謀畫深遠類如此，誠令人起無限之欽佩。吾觀總裁於濟南五三慘案以後，七七抗戰以前，對日之政策，亦往往與曾氏若相符合，一似先後同揆者，是殆「英雄所見，大抵相同」也！

九 積極提倡洋務以圖捍禦更大之外侮

關於曾氏具有民族思想之史實，斑斑可考。其所以對滿清採取緩進，而不採取急進之原因，惑已於上文言之。然曾氏之政治理想，不僅為抑滿扶漢，且欲捍禦更大之外侮，故積極提倡洋務運動，以圖國家之富強也。清自鴉片戰爭及八國聯軍後，外患迭迫，國勢危岌，而其時國人猶蔽於故見，以不談洋務為高，即有倡議改革者，率為羣議所阻。曾氏獨能不狃於苟安，不拘於成法，而作自強之運動，積極提倡洋務；厥後李鴻章繼之，更力行不怠，頗獲相當成績，為新法奠定基礎，開風氣，造時勢，洵難能可貴也。關於此點，薛福成氏於其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中，曾有敘述。如云：

「自泰西各國通商以來，中外情形，已大變於往古。會國藩深知時事之艱，審之又審，不肯孟浪將事，其大旨但務守定條約，示以誠信，使彼不能求逞於我，薄物細故，或所不校。會國藩自謂不習洋務，前歲天津之事，論者於責望之餘，加以詆議。會國藩亦深自引咎，不稍置辯，然其所持大綱，自不可易。居恆以隱患方長為慮，謂自強之道，在於懸積討累，一步不可踏空，一語不可矜張，其講求之要有三：曰製器，曰學校，曰操兵。故於滬局之造輪船，方言館之繙譯洋學，未嘗不反覆致意；其他如操練輪船，演習洋隊，挑選幼兒出洋肄業，無不求為自強張本，蓋其心兢兢於所謂繙譯未雨之謀，未嘗一日忘也。」

曾氏對於中國近代之教育，尤有重大關係。何貽焜氏於其所編著之會國藩評傳中亦言之。如謂：

「符新城氏編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，其所謂近代，斷自開治元年，蓋以是年北京初創京師同文館也。惟同文館之設立，僅研誦西文，以養成交涉人材為目的，科學方面，未甚注意。自江南製造局及福建船政局附設學堂，以屬於製造方面之科學教授生徒，於是科學教育，始逐漸萌芽。後又有派遣幼童赴美留學之舉，更開留學界之先聲，直接向外國學習各種科學矣。惟其時所特別注意者，均屬於軍備方面之科學耳。江南製造

局附設學堂、教授科學、以及派遣幼童留學。曾公均主持其事，故迴溯中國近代之教育，曾公亦有相當之關係。」

曾氏逝世後，容閱感念其興學之功，及其愛護教育之熱忱，嘗於其所著西學東漸記中，對曾氏深為悼念，如謂：

「曾氏之逝世，國家不啻壞其棟樑，無論如何，無此損失鉅也。時預備學校（當時考取留美之學生，須先入預備學校一年，肄習中西文字。）開學纔數月，設天假以年，使文正更增一齡者，則第一批學生已出洋，猶得見其手植桃李，欣欣向榮。惜夫世之創大業者，造化往往不錫以永年，使得親見手創事業之收效，此種缺憾自古如斯。然創業之八既播其種子於世，則其人雖逝，而此種子之華生繁殖，固已綿綿不絕。故文正種因，雖未獲親觀其結果，而中國教育之前途，實已永遠蒙其嘉惠。今日莘莘學子，得受文明教育，當知文正之遺澤，勿忘所自來矣。文正一生之政績，忘心人格，皆遠過於儕輩，殆如埃浮立司脫高峯（Mr. Everest）獨聳於喜馬拉耶（Himalaya）諸峯之上，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。予聞文正臨危時，猶念念不忘教育事業，深望繼承者之李鴻章，有以竟其未竟之志云。

蔣廷黻氏於其所著之中國近代史大綱中，對曾氏維持滿清之苦心，及接受西洋文化之偉舉，均有論及。其言

一他（指曾氏）怕滿清的滅亡，要引起長期的內亂，他深知中國歷史的。我國幾千年來，每次換個朝代，總要經過長期的割據和內戰，然後天下得統一和太平。在閉關自守，無外人干涉的時代，內戰雖給人民無窮的痛苦，尚不至於亡國。到了十九世紀，有帝國主義者環繞着，長期的內戰，就能引起亡國之禍，曾國藩所以要維持滿清，最大的理由在此。

在維持滿清，作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，曾國藩的工作，分兩方面進行，一方面他要革新，那就是說，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份。另一方面，他要守舊，那就是說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，革新守舊，同時舉行，

這是曾國藩對我國近代史的大貢獻，我們至今還佩服曾文正公，就是因為他有這種偉大的眼光。」據蔣氏觀察，曾國藩欲維持滿清之原因，是因有帝國主義者環繞着，恐滿清滅亡，要引起長期內戰，易召亡國之禍。在維持滿清大前提之下，一方面要接受西洋文化一部份，另一方面要恢復我國固有美德。所謂接受西洋文化一部份，亦即本書所謂倡導自強運動，或謂之洋務運動，蔣氏認為對我國近代史上之大貢獻，而欽佩其有偉大眼光者也！陳懷氏於其所著之中國近百年史要中，對曾氏之提倡變法，以圖自強而禦外侮，嘗有記載。如云：

「曾國藩……所造就薦拔人才不可勝數，凡規畫天下事，無不效者。自軍旅漸平，百務創舉，恍然於世變之日新，知篤守故常之不足以圖自強。而禦外侮，舉凡勸農、課桑、修文、清訟、戢暴、去貪、以及整頓鹽務、開墾荒地、鑄造軍械、仿製輪船、派遣出洋子弟等，莫不手定章程，規模具備，其所措置，皆深合於時變運久之義，情未竟其用，而所練湘軍，亦迄遭讒人之搆，裁撤殆盡。」

胡哲敏氏對曾氏之平洪楊，則認為平內亂。對其苦心孤詣，提倡洋務，卒奠近代新事業之基礎，則美之為識時之士。在其所編之曾國藩一書中嘗言之，如謂：

「內亂平定了，地方秩序漸漸恢復原狀了，曾國藩的意思，就想替中國做些革命事業。原來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，接着又是英法聯軍入京，彼時凡與外人接觸，沒有一次不是大吃其虧，中國賢士，已很有些覺悟，知道中國確有不如人的地方。曾國藩在江西時，已感覺外人的輪船槍砲的厲害，他自己的軍營中運送軍火，就常用小輪拖送。後來李鴻章利用西人洋槍隊常勝軍，以平太平天國，就更覺西人的堅甲利兵，輪船機器，為其富強之源，頗有起而仿效的心願。故曾氏嘗云：「欲求自強之道，終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，以學作炸礮、學造輪舟為下手工夫。但使彼之所長，我皆有之，順則報德有其具，逆則報怨亦有具。」是時與外人交涉，日益頻繁，政府迫於環境，乃於民國前四十九年（一八六一年）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辦洋務，——後演進為今日之外交部。自是之後，洋務二字，遂為識時之士的時髦名詞。……然而我們

進一步想，以後時機地的眼光衡量他們，則曾孝等所倡的洋務，雖然很膚淺幼稚，畢竟算識時之士。他們把自己不如人而應做效人的地方，竭忠盡智，一點一滴的去幹，儘管大家譏笑反對，他們仍是埋頭去幹。咸豐四年，曾國藩便設礮局，做製西洋水雷，雖然沒有什麼效果，卻見得他當時的意志。……

以上所舉之新興事業，為當時最著之數種。此外如海關之改組，煤礦的開採，各種學校的興辦，不一而足。雖當時反對洋務者，上下皆然，而曾李等苦心孤詣，卒建築成功近代新事業的基礎。可惜後起的人，未能把他們的事業發揚光大，甚至把他們那點基礎還斷喪了許多，而又掉轉過來譏笑曾李等見識短小，真未免太易其言了。

當時所辦的洋務，自表面看來，自然大家要歸功於李鴻章、左宗棠、劉銘傳一輩人，以為曾國藩在當時已成過去的人才了。不知當時所倡辦的新政，許多是國藩親自倡辦的，許多是幕府僚屬秉承國藩之志而行的，即如郭嵩燾、薛福成、曾紀澤，皆歷使各國，為外交上老前輩，但此三人者，都是國藩培植成功的。

毓樞氏於其所著國史大綱中，對曾氏及其幕友郭嵩燾等主張變法自強，曾盛加稱許，然亦惜其未能一展抱負。如云：

「變法自強，本屬相因之事，而當時人則往往並為一談。一則清廷以專制積威，統治中國已達二百年，在滿洲君臣眼光裏，祖法萬不可變。二則漢人在此專制積威政體下，亦多逐次腐化，當時政界裏真讀書明理，懂得變法自強之需要與意義者亦少。……在這一種政治的積習與氛圍中，根本說不到變法自強。縱有一二真知灼見之士，他們的意見，亦浮現不到政治的上層來。（郭嵩燾謂：西人富強之業，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，然其致富強，固自有在。竊論富強者，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，其源由政教修明，風俗純厚，百姓家給人足，以成國家磐石之基，而後富強可言也。豈有百姓困窮，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？今言富強者，一視為國家本計，與百姓無與，風俗頹敝，盜賊肆行，水旱頻仍，官民交困，岌岌憂亂之不遑，而輕言富強，祇

益其侵耗而已。嵩濂以此告李鴻章，鴻章則曰：西洋政教規模，弟雖未至其地，留心諮訪考究，幾二十年（此光緒三年語），人才風氣之固結不解，積重難返，由於崇尚時文小楷誤之，其實即以鴻章言，恐亦未能深切瞭解郭氏之意，晚清大臣能語此者惟曾國藩，曾氏已死，郭氏此等議論，索解人不得矣。）……

晚清全部政治徹底改革之運動，亦可分爲兩節：第一節是戊戌變法，……大抵當時變法，牽一髮，動全身，苟求全變，勢不能速。若使有統籌全局之君相，慎思密慮，徐以圖之，庶乎有濟，而清室諸帝，自咸豐以下，皆非其人。以大臣言，智慮氣魄足以勝者，惟一曾國藩，既已老於兵旅封疆，未能對整個政局一展其抱展，李鴻章繼會而起，智局氣量已不如曾，清廷亦從未用之中樞，使有一統籌全局之機會。」

柳詒徵氏於其所著之中國文化史中，對曾李之變法圖強，亦盛讚其有深識焉。如云：

「近世輸入西方之文明，自譯書外，以游學爲一大導線。初各國訂約，未有及游學者，同治七年，志剛孫家穀等，使美訂中美續約，始立專款，會國藩李鴻章等遂議遣幼童出洋肄業。初次率領學生赴美者，爲刑部主事陳蘭彬，江蘇同知容闕。學生抵美多在哈佛（Harvard Univer.）各校肄業；其後沈葆楨督辦福州船政局，又請選派生徒出洋肄業，此游學之第一期也。……

中國近世之事變，原因非一，其最大之一因，則歐美之發明機械也。……其後鴉片之戰，天津北京聯軍之役，胥此等機械成之。咸同之交，吾國深識之士，知世局既變，吾國不可墨守故技，而不及之變，故以仿製機械爲立國之要圖，而五千年閉關自守之國，乃崛起而與世界日新焉。仿造機械，始於曾國藩，李鴻章繼之。創建江南製造局於上海，同時南京天津亦設立機器局，福建則設立船政局，雖多以製造船械爲主，偏重於海陸軍之用，然始意未嘗不爲生利計也。其時學者如徐壽、華蘅芳及壽子建寅等（時曾文正設江南製造局，令徐壽總理局務），皆殫心研究，具有成效。光緒初，山東設立機器局，建寅實主其事。朝鮮之變法，且遣人至天津學造器械焉。通商之始，各國輪船廢至，吾國航業之利，幾盡爲所奪，於是議者思倡行商船，同治十一年，始設局招股，購置輪船，光緒二年，收買美國旗昌公司船隻，其業始盛。迄今數十年，招商局

船，……爲吾國航業公司之巨擘，其內河商輪，亦年有增設，……較之咸同以前，航行江滬專特帆船者，其敏鈍霄壤矣。」

朱孔彰氏於其所著之中興名將列傳中，亦謂：

「曾公陰有爭奪海上之志，設立軍械所於安慶，仿照輪船，逾年成小輪一號，試之江，可用，乃使同知容闈往美利堅採辦機器洋鐵，時李鴻章亦自購機器，設局上海，用西法製造槍礮，中國機器之興，歲益增盛，自此始。後公益派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，肄習技藝，期十五年還，仍以容闈往，……其遠略如此。公學究天人，於書無所不讀，治軍行政，務求踏實，或籌議稍迂，成功轉寄，發端至難，取效甚速。凡規畫天下事，無不效者。」

又章息予氏於其所著之李鴻章一書中，對李氏亟亟注意造船練兵，努力於軍政之改良，亦有敘述。而認爲當時中國興辦洋務，雖不止李鴻章一人，而以李鴻章之力居多。觀此，則李氏之功，亦有足多矣。茲節錄其原文如左：

「李鴻章率淮軍至上海，爲其成爲全國軍事重心的發軔之始，亦爲其中世二十餘年事業的發軔之始。李鴻章中世二十餘年的事業是什麼呢？概括說來：便是所謂洋務。洋務這名詞，即係李鴻章所創，其意指洋人之所務而言。上海有洋人的居留地，有洋兵保衛地方，所以李鴻章一至上海，即與洋人發生關係，而漸爲洋人之所務。洋人對於李鴻章，起初不甚重視。及至李鴻章在上海附近把大隊太平軍洗着擊破之後，方始佩服。而李鴻章的對付洋人，也能用擊破的手段，對於桀傲不馴的洋將白齊文，很果斷的用紀律制裁。因而同治二年（民元前四九，西元一八六三）正月，即被任命署五口通商大臣，而他也就奏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於上海，創興洋務。平吳之功告成後，李鴻章眼見洋兵鎗礮精良，深知中國兵力平內亂尙可，要抵禦外侮，便不濟事，於是亟亟注意造船練兵，努力於軍政的改良。又以西洋各國，不但兵強，而且很富，遂亦致力於交通事業和工商業的開創。這種富國強兵之道，李鴻章和當時一般人，即名之曰洋務，當時中國興辦洋務

的，雖不止李鴻章一人，而以李鴻章提倡之力居多。是皆會李所提倡之洋務運動，以圖國家富強之可考者。會李而外，尚有胡燏棻將左宗棠，亦為提倡洋務運動之最力者。茲將其三人所舉辦之新事業，擇要列表如左。

年	份	舉	辦	事	業
同	治	元	年	會國藩創機器局於安慶。	
同	治	二	年	會國藩派容闈出洋購買機器。李鴻章設廣方言館於上海，教西語西學。	
同	治	四	年	會國藩李鴻章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，附設譯書局。南京天津亦分別設立機器局。	
同	治	五	年	左宗棠設輪船製造局於福州馬尾（後交與沈葆楨）。	
同	治	九	年	李鴻章設機器製造局於天津。（茲係會國藩督直時設立，由鴻章擴充整理。）	
同	治	十	一	年	會國藩李鴻章挑選學生 <u>唐紹儀</u> 、 <u>梁誠</u> 、 <u>梁敦彥</u> 、 <u>容驥</u> 、 <u>歐陽庚</u> 、 <u>侯良登</u> 、 <u>詹天佑</u> 、 <u>鄭爾生</u> 等赴美，李領者為 <u>郭紹宗</u> 、 <u>陳雨彬</u> 、 <u>江蘇</u> 、 <u>同知</u> 、 <u>容闈</u> 。 李鴻章設輪船招商局。派武弁往德國學習軍械技術。請開煤礦。
光	緒	元	年	李鴻章籌辦鐵甲兵船。請設洋學局於各省，並變通考試功令，另開洋務一格。	
光	緒	二	年	李鴻章派下級軍官赴德學習陸軍，派福建船政學生赴英法學習。	
光	緒	四	年	左宗棠在甘肅設機噠機器廠。	
光	緒	六	年	李鴻章創設海軍，向外國訂造軍艦。設水師學堂於天津。設電報局。請修鐵路。	
光	緒	七	年	李鴻章設開平鐵務局。	
光	緒	八	年	李鴻章築旅順軍港。創辦上海機器製布廠。	
光	緒	十	一	年	李鴻章設武備學堂於天津，挑選各防營勇弁入學。

光緒	三十三年	李鴻章開辦龍江漢河金礦。
光緒	三十四年	李鴻章成立北洋海軍。
光緒	三十五年	李鴻章設醫學堂於天津。

綜上各項自強事業，以津、滬、閩為中心地點，均與國防有關。曾、李、左則為主持人物，如機器局之大部份，實為兵工廠也。築軍港，訂造軍艦，設武備學堂，成立北洋海軍，派遣學生出洋等，固直接有關軍事建設。即如設方言館、修鐵路、設電報局、開煤鐵礦、創機器製布廠、設輪船招商局等，或為介紹學術，或為便利交通，或為開發富源，亦間接與軍事建設有關。自今日視之，雖似平常，而在彼時風氣蔽塞之際，曾、李、左等能注意及此，致力於富國強兵，向着捍禦外侮之途邁進，有筚路藍縷之功，不可謂非遠大眼光也！谷春帆氏於大公報三十二年五月星期論文「工業化的精神」一文中，對鴻章之努力練新軍，辦工廠，亦認為有相當成績。惟惜其不能勇往邁進，摧毀一切阻礙耳。茲節錄其原文如左：

「同治十三年（西曆一八七四年）李鴻章論當時國際局勢說：『海疆萬里，通商傳教，來往自如。』陽託和好之名，陰懷吞噬之計，國生事，諸國構扇，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。輪船電報之速，瞬息千里，軍器械事之精，工力百倍，礮彈所到，無堅不摧，水陸關隘，不足限制；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。』他們的對付方法，是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。換句話說，即是以中國的傳統精神，來仿辦西洋的新法專業。他們練新軍，辦工廠，不能說不努力，不積極。直到抗戰，中國唯一大船廠，是他們辦的船廠，中國唯一大鋼鐵廠，也是他們辦的鋼鐵廠。然而中國究不會富強起來，至少沒有像預望那樣富強。他們就錯了一點，他們不知道，辦工業有辦工業的精神，缺了這一點精神，新工業就無從辦好。……我要說的工業化的精神，是西洋工業革命以來，指導工業生產以至政治社會的根本精神。簡單說：可以『勇猛精進』四字來表示。工業革命發生之初，生產力發展解放，當時人憑藉一股獨立奮鬥勇往邁進的精神，不顧一切困難，摧毀一切阻礙，以

求個人事業的成功。這是一種堅苦強毅，一些不容許人情，一些不含混苟且的精神。當時工業發展，尤其在英國，正與清教徒的宗教改革同時，亦很受其影響。這種精神發展成爲公共道德的基礎，在政治上掀起了法國的人權革命與美國的獨立戰爭。鐵路輪船與天空的交通，創造了世界爭霸的雄圖。任何時，任何地，可以尋到一個勇猛精進求高求大求強求權的力量在後面推動。這樣一種捲盪世界衝激人類的狂流，正是工業化的一貫精神。」

至李鴻章之處理國事，誠難免不有錯誤，然清季外交之失敗，若盡歸咎於李鴻章一人，則亦昧於時代環境，而非公允之論也。善哉章息子氏之評鴻章曰：

「綜觀李鴻章的一生，在當時的中國，實爲第一流緊要人物，他個人的傳記，簡直與當世中國的歷史分不開。但是從太平軍的條敗，以至義和團的變亂，實爲中國淪入半殖民地，地位最關緊要的時代。李鴻章既是這一時期的第一流緊要人物，其所負的責任，當然不小。所以一般人痛念國恥，往往歸咎於李鴻章。李鴻章的處理國事，誠不免有所錯誤，尤其是在外交方面。然而若將國恥的罪過，完全推在李鴻章的身上，那也不免太冤枉了他。梁啟超以爲「李鴻章爲時勢所造的英雄，非造時勢的英雄。」這評論很確當。中國的淪爲列強的半殖民地，乃係時勢所必然，決非僅由李鴻章的錯誤所致，而李鴻章的錯誤，則完全是受當時中國社會的影響。要知道李鴻章所處的時代，是一個非常的大時代，而中國已處於非常危急的時勢，惜乎李鴻章不是非常的人物，不是造時勢的英雄，不能挽救這種非常危急的必然的時勢，這是中國的不幸，也是李鴻章的不幸。」

李鴻章所處的時代，是一個非常的大時代，這個非常的大時代，是歐洲人所創造的，自從西元一四八六年（民國前四二六）地亞士（Dias）發見好望角（Cape of Good Hope），一四九二年（民國前四二〇），哥倫布（Columbus）發見新大陸之後，歐洲各國，便紛紛致力於殖民事業的競爭，最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，繼起的有荷蘭、法蘭西、英吉利……

至一八五七年（民元前五）李鴻章三十四歲時，印度發生大革命，東印度公司乃以印度的統治權，完全讓給英國政府，一八七七年（民元前三五）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為印度女皇，這惹英國執到殖民事業牛耳的一個具體的表徵。英國的統治印度，給予亞洲局勢的影響亦不小，歐洲其餘的帝國主義國家受其刺激，當然也積極向遠東發展，法國的勢力，被排出印度後，即轉其方向於越南。俄國由中亞細亞向南的出路被擋住了，便傾全力以經營黑龍江流域和東三省、朝鮮等處。他們努力與英國相競爭，中國就大受其影響，中法戰役與中俄密約，即由此而生，而李鴻章適當其衝。

帝國主義者在遠東角逐，日本起初也處於被壓迫的地位，一八五三年（民元前五九）李鴻章在原籍隨呂實基練鄉勇時，日本也被英國威脅，不得已開通通商口岸，可是短小精悍的日本人，一受刺激，即便驚覺，居然也奉行帝國主義，發憤為雄，不久竟迫隨着歐美列強，努力於殖民事業了。其殖民事業的目的，便是在我們中國。於是先着手於攫取中國的藩屬，第一步既豪奪巧取的吞併琉球，第二步便苦心孤詣的經營朝鮮。其時中國軍事外交的重心，方集中於李鴻章的身上，日本突飛猛進的經營朝鮮，就使這英名蓋世的李鴻章，遇到了殊窮毒辱。」

又周子亞氏在三民主義半月刊第一卷第九期「李鴻章與反日外交」一文中，對鴻章辦理外交，深致贊美，而亦惋惜其所處之環境惡劣。其言曰：

「在中國外交史上，有過一位人物，此人具有國策上遠大的見解，懂得外交上縱橫捭闔的秘訣，曾經親自出馬，替國家當過幾次驚濤駭浪，了過多回糾紛案件。但因機敏有餘，膽識不足，復以時際不遇，報效無門，落得個英雄晚年走末路，歸根求一杯黃土蓋白骨；為後人非議，為後人嘆惜，此人即是中外咸知聞名天下的李鴻章。」

李鴻章……在國內與會國藩、左宗棠、李秀成、張之洞同為巨豪，先後齊名。在國際舞臺上，則與俾士麥、梅特涅、格羅斯頓、麥亞士、伊藤博文、井伊直弼，適逢其會，互爭雌雄。就中外關係說，則那時正是

西力東漸，中外交涉開始之時，李鴻章代表那一時代的中國，與列強斡旋，所以更爲出名。李氏代表那一時代的中國，因此不僅是一個外交家，同時又是一個軍事家，一個政治家。……李鴻章辦理清廷時代的中國外交，以天津教案開始，以辛丑和約結尾。……其中重要的，是中日戰爭與中俄密約，其餘案件，他只是一個折衝者，一個收場人，代表西山落日的清廷，接受一些辱國喪權的條件而已。

要明白李氏辦理當日中國外交的情況與苦衷，必先了解當日中國的國際環境及列強對於中國的態度。鑒於初平，內憂甫弭，但是外交上緊張形勢，卻隨之而至。列強認爲中國可欺，瓜分之說，一時甚囂塵上，除了英、法、德、俄以外，日本也開始在中國身上，取得一些分外之財。所以其時中國外交形勢，真是惡劣至於極點，任何地方，任何時間，都可以發生不幸事件。稍一不慎，即可引起中外糾紛，構成交涉侵略的藉口。辦強國外交容易，辦弱國外交困難。何況李鴻章有時更自命不凡，不顧低首於外人之前，故而他當日辦事之棘手，處境之困難，我們可以想像得到。但李鴻章畢竟是個有遠略之人，在列強紛紛覬覦中國的局面之下，他想到中國如不出奇制勝，以夷攻夷，則國運將永無翻身之日。因此他主張攘賊先擒王，先以日本關刀：『日本爲中國之大敵』，先制服日本，其餘國家當不成問題。所以甲午年的中日戰事，可以說是他反日外交的第一顆棋子。其後中國打敗，日本戰勝，外患更是迫近門前。李氏一看形勢不對，便暗中聯絡與國，來應付日本；中俄密約，就是反日外交轉到親俄政策外交上的第二顆重要棋子。其後他藉赴俄賀壽之名，曾遠遊歐陸，聘問德國，其間一言一行，皆與他反日外交有很大的關係。可是時際不遇，這兩顆棋子，並未下準。反日外交的結果，訂立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，中俄密約的結果，引起了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產生。遠聘德國，只與俾士麥有了一席之談，並無具體結果。（相傳李鴻章歷聘歐洲，見德相俾士麥，叩之曰：爲大臣者，欲爲國家有所盡力，而廷臣羣掣其肘，欲行其志，其道何由？俾士麥告以首在得君，得君既尊，何事不可爲。李曰：苟其君惑於衆口，居權要侍近習者，假威福而挾持大局，則如之何？俾氏良久，曰：大臣以至誠憂國，度未有不能格君心非者，惟與婦人女子共事，則無如何矣。李默然。此可見當時李鴻章之苦悶

也。○義和團事件，反使羣夷形成一線，對中國作一次總攻。『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，』這兩句詩，對李鴻章可說用得再適當也沒有了。……

遠在二十年以前，李氏已經看出中日戰爭的難以避免。……可惜清廷不振，不能利用李氏的遠見卓才，以致甲午之役，中國大敗，還要他出來收拾殘局，訂立和約。當他在日本被刺時，醫生說要剖取槍子，李氏慨然拒絕曰：「國步艱難，和局之成，刻不容緩。予焉能延宕以誤國乎？予甯死，無剖。遇刺的第二日，有人見他血滿朝服，因此帶諷含刺的問他：「此血之所以報國邪？」鴻章隨口回答：「舍予命而有益於國，亦所不辭。」因為他這種忠心和硬氣，日本政府對和約不能不相當讓步。

甲午年中日戰爭的失敗，對於李鴻章個人可說是一個很大的刺激。如何報此血恨深仇，便成爲李氏心中的第一要事。遠交近攻，以夷制夷，是外交上一個鐵則；李氏也很知道這個原則，所以在謀日以前，對俄的外交，早已有讓步。……在外交上不能同時對敵兩國，借一強以攝他強，李鴻章可算得懂得外交上的秘訣了。

聯俄政策的第二次表現，即在甲午之役前後。當時日本勢力的長大，他的策略，是內政上興海軍以固國防，外交上聯俄國以爲外援。在中日戰爭前十年，李氏即主張聯俄。……甲午之役爆發，李鴻章十年前的預言，成爲事實。不幸李鴻章的反日外交，配不上當日的反日軍事。他所手創的海軍，第一次出戰即完全覆沒；就這點而論，李鴻章不能辭其咎。然而以「北洋一隅，直隸一省，鴻章一人」抵日本全國，雖然失敗，也情有可原。……總之，李氏認識『日本爲中國永久之大患』，不惜用各種方法，以達到滅此永久大患的目的。後人以成敗論是非者，說中國外交的失敗，應由他一人負責；其實李鴻章有李鴻章的遠見和抱負，可惜當日的種種環境，未能伸展出來。」

韋周兩氏根據當時社會背景，所發之言論如此。則吾人對於鴻章之功過，不難思過半矣。然曾氏穩製穩打，化險爲夷，能爲當時勢之英雄；而鴻章喪權辱國，身敗名裂，不能挽救危急之局勢，其智慮氣魄及成就，

均遠遜曾氏，則亦無可諱言。此鴻章所以不能見諒於國人，而總理所以有澄清天下之志，銳意革命，奔走倡導無窮日，必欲貫徹國民革命，以斬三民主義之實現也！

湘軍系統中主要人物，除李鴻章而外，如左宗棠於洪楊平定後，致力西北邊疆，鞏固國防；劉坤一於庚子拳禍時，倡議東南互保，不受亂命；以及彭玉麟劉銘傳之抵禦法軍，郭嵩燾曾紀澤之折衝境圉，偉烈豐功，難以列舉。要皆受曾氏之教化薰陶，能遙瞻遠矚，爲國家民族前途計也！

十 結論

綜上各節以觀，無往而不見曾氏深具民族思想者。故愚謂不責其無民族思想則已，如責其無民族思想，則其事跡昭然，相望於簡冊。世人對其平洪楊，謂為扶滿抑漢，是乃皮相之見也。而未知其平洪楊，為維持民族固有之傳統文化，又為滿漢勢力消長之重大關鍵。愚嘗反覆考之，然後知曾氏於組織湘軍以前，即已具偉大之抱負，而以蠻夷滑夏為憂矣。試觀其於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，致諸弟書云：

「六弟自怨數奇，余亦深以為然。然屈於小試，輒發牢騷，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！君子立志也；有民胞物與之量，有內聖外王之業，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，不愧為天地之完人。故其為憂也，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，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。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，蠻夷猾夏則憂之。小人在位，賢人否閉則憂之，匹夫匹婦不被已澤則憂之，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，此君子之所憂也。若夫一體之屈伸，一家之飢飽，世俗之榮辱得失，貴賤毀譽，君子固不暇愛及此也。六弟屈於小試，自稱數奇，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！」

書中對於六弟溫甫，志小所憂不大，不憚反覆言之。則知其懷抱偉大，曷嘗不知民族大義哉？厥後曾氏之平定洪楊，維持名教，重刻船山遺書，廣佈民族思想；以及提倡洋務，以圖捍禦更大之外侮，殆視洪楊為頑民，視滿清及外洋為蠻夷，胥基於早歲所抱之志願，按步推進也。孔子曰：「齊一變，至於魯，魯一變，至於道。」愚觀湘軍演變為淮軍，淮軍演變為北洋軍，湘軍颯起為滿漢勢力消長之關鍵，迨至北洋軍，即與革命軍合力推翻滿清，亦分三階段焉。老子曰：「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，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」孫子曰：「故善戰者，立於不敗之地，而不失敵之敗也；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。」蓋成王敗寇，無間古今，與其貿然肇亂，而至身敗名裂，曷若養精蓄銳，待時而發，發即中的，如探囊取物之

爲奮乎！曾氏殆籌之熟矣！彼亦自言：「衆之所趨，勢之所歸，雖有大力，莫之敢逆。故曰：撓萬物者，莫疾乎風，風俗之於人心，始乎微而終不可禦者也。」又謂：「凡民之中，有君子人者，常終身幽默，闕然深退，彼豈生與人異性？誠見乎其大。」斯言也：至堪玩味，曾氏尤能身體力行。早歲以蠻夷滑夏爲憂，中年而後，維護民族文化，重刻船山遺書，培植淮軍，倡導洋務運動，殆無往而不與民族思想有關。湘軍崛起後，取滿清實權而代之，撤退之湘軍，大部加入哥老會，從事革命運動，是皆與曾氏有直接關係也。愚觀曾氏一生，雖未昌言排滿，而以其事衡之，始終具有民族思想，則亦不容抹煞也。昔在周初，太王積德行仁，有葛商之志，三傳至武王，始伐紂而有天下。曾氏不於洪楊時倒清，直至北洋軍時，始與革命軍合力推翻清廷，其事跡頗似太王。而太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嘗遷於岐山之下；曾氏自擊外患落迫，則提倡洋務，以圖自立自強，是其深識憂憤，尤在太王之上矣。章太炎先生，爲排滿最激烈之民族戰士，於曾氏之平洪楊，雖有誤解，然亦嘗以英雄許之，載於所著檢論。其言曰：

「宋教仁在日本與章炳麟計光復事，主者不深信教仁，教仁曾歎曰：『今世固無英雄，其人材之匱絕，將猶有甚隱未備者邪？』章炳麟曰：『夫英雄者，內有識度，亦其所據時地就之，阻與之壤，尊信之民，下不無文學，而上不能郁然，有智略者御之，則羣奉以爲主宰，其將不在大江之岸也？大江之岸，文學已盛，人人各自以爲高賢，從、其以執羈勒，退、則有後言矣，執去則遂崩，雖有文武季叔生處其地，不能人人奉戴之也。誠有英雄，意者將在領脊之南，牂牁之上游邪？必非大江矣。昔德意志人尼采有言曰：北歐叱咤而變新教，舉國同然。是時南歐豈無不逞於舊教者邪？文化深漬，雖有變故之材，不能人人奉以爲大宗，故其執盾而不伸。北歐之人人奉爲宗主者，尊信變教之人多也，尊信多者，其文化淺也。以是比度，則可知已。』宋教仁曰：『其然，吾則沉湘間產也，地迫江浦，猶念曾國藩左宗棠者，起自布衣書生，而能雅陷大敵，人奉爲宗，其是非亡足論，觀其番度，無忝於英雄，其民又樂爲之致死，豈其風烈遂榮於今，抑人才乏耳。』章炳麟曰：『曾左之倫，起布衣草帶間，驅鄉里服未之民，以破強敵。宗棠又能將率南旅，西封天

出，擅其叛逆，則上度皇甫規高，下不失爲王鐸鄭畋，命以英雄誠不虛。」……」

吾聞聰明秀出者稱之英，膽力過人者謂之雄，徒英而不雄，則雄材不服也，徒雄而不英，則智者不歸往也。故一人之身，兼有英雄，乃能成大用。曾氏遭值世變，其所以能陶鑄羣英，大奠區宇，振頽起衰，豪彥從風，遺澤餘韻，流衍數世者，洵非偶然。太炎先生譽之爲英雄，自係篤論也。梁任公先生對曾氏尤揄揚備至，嘗著文贊美，載於飲冰室文集。如謂：

「曾文正公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，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。吾以爲使曾文正生今日，而猶壯年，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。彼惟以天柱之極純厚也，故雖行破壞焉可也。惟以修行之極嚴謹也，故雖用權變焉可也。故其言曰：「札硬寨，打死仗，」一多條理，少大言，」曰：「不爲聖賢，便爲禽獸，莫問收穫，但問耕耘。」彼其事業之成，有所以自養者在也。彼其能率厲羣賢，以共圖事業之成，有所以孕於人，且善導人者在也。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，苟有此志，則吾謂曾文正集，不可不日三復也。」

任公先生之評曾氏，不獨未因排滿家之唾罵而少之；且謂「使曾文正生今日，而猶壯年，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。」則其衷心之欽仰，更非楮墨所能形容矣。他如黃克強服其創行之嚴，云當奉以爲師，以及其他謳歌稱頌之作，多至不可勝舉，茲不具錄。是皆可見曾氏人格之偉大，學識之闊遠，勳業之彪炳，自有其不磨之價值，歷萬古而常新。在當時固爲不世出之將相，卽從現時革命立場觀之，亦有功於國家民族，何可鄙爲不知民族大義哉！

總理於民國十一年八月，曾親自撰書「養天地正氣；法古今完人。」一聯以贈 總裁，想見其對 總裁期望之殷切。然何者始可謂之爲完人，則未明言。以觀之，若曾文正殆不失爲古今完人之一，尤堪爲國人效法者。

民國成立以後，滿清雖被推翻，而武人跋扈，軍閥擅權，幾成唐末藩鎮割據之局。國內糾紛擾攘，歲無寧日，政治迄未步入正軌。總理爲貫徹三民主義計，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，認爲非練成有主義之黨軍，爲中心

武力，不能達到國民革命之預期目的，爰於十三年六月，在粵創辦黃埔軍官學校，任命總裁為校長，招考各地富有革命思想之青年，施以嚴格訓練。總裁將會胡治兵語錄加以增補，作為教本，並為之序曰：

「……夫滿清之所以中興，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者，蓋非人才消長之故，而實德業隆替之徵也。彼洪、楊、石、李、陳、韋之才略，豈不能比擬於會、胡、左、李之藩臣？然而會氏標榜道德，力體躬行，以為一世倡，其結果竟能變易風俗，挽回頹靡。吾姑不問其當時應變之手段，思想之新舊，成敗之過程如何？而其苦心毅力，自立立人，自達達人之道，蓋已足為吾人之師資矣。余讀會胡諸集既畢，正欲先摘其言行，以為後世圭臬者，戒為一書，以餉同志，而留察太平天國戰史於將來。不意松坡先得吾心，纂集此治兵語錄一書。顧其間尚有數條，為余心之所欲補集者，雖無治兵之語，治心即為治兵之本，吾故擇會胡治心之語之要者，另列一目，兼採左季高之言，可為後世法者，附錄於其後。非敢擅改昔賢之遺集，聊以增補格言之不足耳。噫！會、胡、左氏之言，皆經世閱歷之言，且皆余所欲言而未嘗言者也。其意切，其言簡，不惟治兵者之至寶，實為治心治國者之良規。願本校同志，人各一編，則將來治軍治國，均有所本矣！」

於此可見 總裁訓練黃埔軍校學生，以會胡治軍治國之良規為模楷矣。厥後 總裁率領國民革命軍，平定兩廣，誓師北伐，掃除軍閥障礙，完成國家統一，發動對日抗戰，維護民族生存，贊同羅邱宣言，合力抵抗侵略，訂立美英新約，解除百年束縛；是皆基於黃埔建軍，為成功重要因素也。

一 武力之於國家，其關係有如此：故會氏之創立湘軍，一方面維持民族固有之傳統文化，一方面則為滿漢勢力消長之重大關鍵。世人未加深察，致忘其為民族立功，愚雖僭譽，又烏能已於言哉？又烏能已於言哉？總裁於蘆溝橋事變後，在南嶽軍事會議訓詞中，對會胡亦盛加推崇。如謂：

「我們現在要挽救國家，復興民族，要與世界列強並駕齊驅。我們必須效法會胡忠誠樸拙，和衷共濟的精神，堅持奮鬥，貫徹到底。如果我們全國上下，能團結起來，致奮鬥，就一定可以消滅倭寇，永絕外患，建立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，為世界和平永久的柱石。」

是亦可見 總裁對會胡信仰之篤，數十年如一日。欲消滅倭瘡，永絕外患，亦非效法會胡不可矣。會氏教子弟之道，有八本之說，如謂：

讀古書以訓話爲本，

作詩文以聲調爲本，

事親以得歡心爲本，

養生以少惱怒爲本，

立身以不妄語爲本，

治家以不晏起爲本，

居官以不要錢爲本，

行軍以不擾民爲本。

愚觀 總裁於二十四年十一月，手訂之黨員守則十二條：

一、忠勇爲愛國之本，

二、孝順爲齊家之本，

三、仁愛爲接物之本，

四、信義爲立業之本，

五、和平爲處世之本，

六、禮節爲治事之本，

七、服從爲負責之本，

八、勤儉爲服務之本，

九、整潔爲進身之本，

十、助人爲快樂之本，

十一、學問爲濟世之本，

十二、有恆爲成功之本。

則亦與曾氏八本之說，若合符節。曾氏嘗言：「辦事之法，以五到爲要。五到者：身到、心到、眼到、手到、口到也。身到者，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，親巡鄉里；治軍則親巡營壘，親探賊地是也；心到者，凡事苦心剖晰，大條理、小條理、始條理、終條理、理其緒而分之，又比其類而合之也；眼到者，著意看人，認真看公牘也；手到者，於人之長短，事之關鍵，隨筆寫記，以備遺忘也；口到者，於使人之事，既有公文，又苦心叮囑也。」而總裁教人治軍辦事，亦極注重心到、目到、口到、手到、足到，其自身尤能力行不怠，在在表現其五到精神，一似與曾氏聲氣冥合者。總裁生平最喜稱述曾氏之爲人，而於其覆篋耕書，尤特爲稱讚，認爲生平爲學治事，得力於此書者甚大，又嘗以此書全文，諄諄勸勉吾儕。凡此：均可覘其對曾氏衷心景仰之一斑。愚以爲，總裁與曾氏，雖時代有先後，而其生平志業行誼，則頗相類似。總裁之黃埔建軍，是猶曾氏之創立湘軍也。而皆遭值世變，秉承中華固有之傳統文化，適應現代社會環境之需要，氣度宏闊，廣包兼容，堅忍卓絕，力圖自立自強，踐履篤實，以誠爲一世倡。其結果均能轉移風氣，安內攘外，立大功，建大業，炳耀寰宇。然總裁之功業，不僅與曾氏相媲美，且凌駕而上之，猗歟盛哉！

大哉曾公！大哉總裁！民族之柱石，國家之干城，蓋世之英，時中之聖也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！

附陶希聖先生覆著者原函

德亮兄大鑒：客夏承殷殷函問，至爲銘感。（中略）頃讀大著「曾國藩之民族思想」原稿，足見功力之勤，可佩也。弟以爲中國國民黨於太平天國與曾文正，實兩承之。其淵源實微妙而錯綜，且歷史上亦頗有先例。弟稍緩當另函略論之，或可爲兄訂此稿之一助也。此請大安！

弟陶希聖上

一月二十六日

跋

本書完竣以後，辱荷陶希聖先生憐冗，喜予審閱，並覆函嘉許（原函已載入本書）。陶先生於抗戰前，曾主持國立北京大學兩研究所，並主編貨雜誌，現任中央宣傳部編審室主任兼中央政校教授，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等書。認為辛亥革命與曾文正亦有密切關係，曩嘗與愚詳論之。茲函所言，僅引其緒，已可窺見本黨與湘鄉之源一斑。而其卓識偉見，尤為拙著張目，感幸曷既！愚以為總理之革命，對洪楊之排滿運動，固深表同情，而於中國固有之傳統文化，亦主保持與發揚，典籍具在，不容忽視。總理之三民主義，其所以能成爲救中國之唯一主義者，即因其淵源於中國固有思想與民族精神。太平軍在中國攪亂十四載，略地十七省，而終致失敗者，則因其所持之主義，不適合中國之國情。此總理所以異於洪楊也，此本書所以編著也。又嘗思之：洪楊發難於金田，以推翻滿清統治，恢復漢族政權相號召。湘軍崛起於嶽麓，以保衛桑梓安甯，維持中華名教爲職志。一則追念遠祖豐功，一則不忘先民勞績，名相反，實相成，而皆有裨於總理所倡導之辛亥革命，是亦殊途而同歸也。

何善樵將軍，嘗主持湘政象第四路軍總指揮，七七事變後，由內政部長遜軍事委員會鄧委員會主任委員，現兼孔學會常務理事，著有大學古本講義，小康與大同等書。原擬爲拙著點撰序文，對曾文正維護民族固有文化之功績，加以闡揚，旋因公務殷繁，適以題簽見貽，大筆如椽，堪爲本書增光。諸荷高誼，特此誌謝。

又本書已在排印中，忽閱及七月十九日中央日報載有中央政校教育程天放先生所著「中央政校畢業生之使命」一文，將總裁訓練軍隊中官兵暨中央政校學生之苦口婆心，教以大義，與曾文正公之訓練湘軍，相提並論；且謂總裁訓練國民之辛苦，實在曾文正公以上。與愚意願不謀而合，喜不自勝，亟爲摘錄如左：

「十六年來，總裁無時無刻，不以在中央政治學校剴切訓示學生明禮義、知廉恥、負責任、守紀律、忠黨愛國之大義，號召全國，以激發國民之良知。其訓練軍隊中之官兵者以此，其告各大學中之師生者以此，其勉各機關之主管與僑僑者亦以此。當年曾文正公訓練湘軍，每逢三八操演，往往集合鄉勇，教以大義，反復開說，數千百語，恆至舌敝唇焦。回顧十六年來，總裁訓練國民之辛苦，實在曾文正公以上。皆可謂苦口婆心，誨人不倦。」

於此可徵愚之比附，雖憑個人一時研究所得，時賢亦有同感者矣。海內博雅君子，幸垂教焉！

德亮再識

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

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



分類號.....*f.3201*.....
1020

登錄號.....*D0638*.....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

(18610渝藝)

曾國藩之民族思想一冊

渝版熟料紙

定價國幣壹元陸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版權所必印翻
有究必印翻

編著者 王德亮

發行人 王雲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BC

27=52